

中央宣傳部叢書



和平主張與和平運動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編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5856B

57c

# 和平主張與和平運動

## 目錄

卷頭語

豔電

豔電書後

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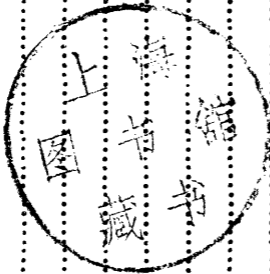
怎樣實現和平

中日和平的基礎

怎樣獲得和平

和平運動之目的與手段

中日和平與亞洲前途



汪精衛

汪精衛

汪精衛

汪精衛

褚民誼

陶希聖

陶希聖

胡蘭成

1529420

戰由國民黨戰和由國民黨和之事實與理論……………曾芝生

和平運動的思想主幹……………魯畏公

我們需要怎樣的和平……………中華日報社評

和平運動的把握……………中華日報社評

創造擔當和平的力量……………中華日報社評

和平之道……………中國公論社論

## 卷頭語

中日兩國根本沒有必須戰爭的理由，但戰爭竟展開了已經二十九個月還沒有停止，這是中日兩國當局都應負其責任的。因為日本以為要建立霸權的政治基礎和經濟基礎，不得不統治地大物博的中國；也只有地大物博的中國，才能幫助日本建立霸權，才能保障其生存與繁榮，所以日本數十年來對華的政策，無論採用任何方式，都以此為最高目的。但二年來戰爭的教訓，證明日本要建立霸權以保障其生存與繁榮的，不是用武力所能生效的，只有誠意的協助與公平的合作，才有希望。因此近衛的聲明，我們不能看作迷人的騙局，而必須認為是日本朝野接受戰爭的教訓而重新認識中華民族精神的覺悟表示。

中國是酷愛和平的國家，中華民族是酷愛和平的民族，但一旦民族國家的生存遭受迫害時，其蘊藏於社會各階層的潛在力，就會發生偉大的反抗作用，

這不論從過去的歷史上和目前的事實上，都可加以證明。因此中華民族爲反抗日本的武力迫害，而燃起抗戰的火燄，固是十分自然的；但我們不能過分高估這種力量而忽略了自己的缺陷，即政治組織與武力配備的缺陷，而這種缺陷不是短時期內所能補救的，所以中國的抗戰，應爲爭求國家民族的獨立生存而不得已的抗戰，祇要有了和平的希望，就應該捨棄戰爭而從事和平。和與戰都不過是到達國家民族獨立生存之目的的手段，假使和而必須亡國滅種，那當然只有繼續打下去，假使和固然會亡國滅種，而戰爭亦不過亡國滅種，那戰爭還是要繼續下去的，假使戰必亡國而和可不亡國，或戰雖不致亡國，而和也不致亡國，那我們當然主張和，總之無論和與戰的決定，是必須以民族國家的利益爲前提，這是不容忽略的。所以自近衛聲明以後，日本既已覺悟過去的錯誤，而誠意的向中國伸出和平之手，那中國政府當局，當然也應該予以善意的接納，進而商討和平的具體方案。詎重慶政府竟違背本黨歷屆會議的和平意旨，拒人于千里之外，致汪先生被迫離渝，而發表其響應和平的艷電主張。

現在雖然國內的和平運動已逐漸普遍化與深刻化，而日本朝野對和平的認識也較過去更爲切實，但因蔣政權和中國共產黨的多方阻梗，致使不幸的戰爭未能早日中止，這是非常抱憾的。不過汪先生領導下的重建國民政府及還都運動，已在積極進行中，議和的對手，已可不再期望重慶的蔣政權了！只要本黨同志和全國酷愛和平的同胞們能打破共產黨企圖毀滅中國的枷鎖，而迅速集中在汪主席領導之下，積極推動和平並監督和平，那戰爭的中止，是指顧間事，而真正的永久和平之實現，也就可翹足而待了。

豔

電

汪精衛

重慶中央黨部，蔣總裁，暨中央執監委員諸同志均鑒：

今年四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明此次抗戰之原因，曰：『自塘沽協定以來，吾人所以忍辱負重以與日本周旋，無非欲停止軍事行動，采用和平方法，先謀北方各省之保全，再進而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為最低限度，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為合作原則。』自去歲七月蘆溝橋事變突發，中國認為此種希望不能實現，始迫而出於抗戰。頃讀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關於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之闡明，第一點，為善鄰友好，並鄭重聲明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將仿明治維新前例，以允許內地營業之自由為條件，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俾中國能完全其獨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鄭重聲明，則吾人



依於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則吾人遵照宣言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實爲應有之決心與步驟。第二點，爲共同防共。前此數年，日本政府屢曾提議，吾人願慮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國之軍事及內政。今日日本政府既已闡明，當以日德義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則此種顧慮，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產國際之擾亂的陰謀，對蘇邦交不生影響。中國共產黨人既聲明願爲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則應即澈底拋棄其組織及宣傳，並取消其邊區政府及軍隊之特殊組織，完全遵守中華民國之法律制度。三民主義爲中華民國立國之最高原則，一切違背此最高原則之組織與宣傳，吾人必自動的積極的加以制裁，以盡其維護中華民國之責任。第三點，爲經濟提攜。此亦數年以來，日本政府屢曾提議者。吾人以政治糾紛尙未解決，則經濟提攜無從說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鄭重闡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並闡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佔，亦非欲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

等之原則，以謀經濟提攜之實現，則對此主張應在原則上予以贊同，並應本此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方案。以上三點，兆銘經熟慮之後，以爲國民政府應卽以此爲根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日本政府十一月三日之聲明，已改變一月十六日聲明之態度，如國民政府根據以上三點，爲和平之談判，則交涉之途徑已開。中國抗戰之目的，在求國家之生存獨立。抗戰年餘，創鉅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卽抗戰之目的已達。以上三點，爲和平之原則，至其條理，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適當。其尤要者，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所謂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爲限，此爲中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所關，必須如此，中國始能努力於戰後之休養，努力於現代國家之建設。中日兩國壤地相接，善鄰友好有其自然與必要，歷年以來，所以背道而馳，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瞭其責任。今後中國固應以善鄰友好爲教育方針，日本尤應令其國民放棄其侵華侮華之傳統思想，而在教育上確

立親華之方針，以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爲吾人對於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同時吾人對於太平洋之安寧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須與關係各國一致努力，以維持增進其友誼及共同利益也。謹此提議，伏祈採納，汪兆銘豔。

（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 豔電書後

汪精衛

去年今日，我發表豔電，於今整整一年了，我爲紀念去年今日起見，將豔電重讀一遍，豔電的着重點，在末後幾句：「中日兩國壤地相接，善隣友好，有其自然與必要，歷年以來，所以背道而馳，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瞭其責任」。中日兩國，所以有幾十年來的糾紛，以至於今日的戰爭，如果中國一方面，只是說由於日本之侵略主義，日本一方面，只是說由於中國之遠交近攻政策，那麼，過去的原因不明，自然對於現在的問題，不能解決，而將來的方案，更無從談起。如果能「深求其故，而各自明瞭其責任」，則可知這種糾紛和戰爭，對於『東亞幸福』，對於『太平洋之安甯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都有害無利。那麼，回過頭來，消釋前嫌，向着『東亞幸福』「太平洋之安甯秩序」『世界之和平保障』而共同努力，這纔是中日兩國的百年大

計，凡是從事和平運動的，必須對於這一點有深切認識，不然，必不能從事和平運動。

和平運動的意義，如上所述，我們看看這一年來的中日雙方的輿論，在日本方面，一年以前，早就有對於中日關係須加以重新檢討，重新確定之主張，自從近衛聲明以後，全國輿論，更趨一致，所謂東亞協同體，其定義及其條理，固然還沒有十分確定，但如近衛聲明中所說：『日本盼望中國分擔建設東亞新秩序之任務』，中國要有能力纔能分擔此任務，所以對於中國尊重其主權，并援助其完成獨立，俾之有分擔此任務的能力，這種基本主義，日本輿論與日本政府聲明是一致的。雖然我們有時也會從日本雜誌上，或報紙上看見一些相反的話頭，但在大體上是一致的，日本輿論能夠這樣，是和平運動的一大進展。在中國方面，雖然仍有一部份高唱『抗戰到底』『最後勝利』，但這是假的，這是受着壓力而不得不然的。所以凡是壓力所不及的地方，真輿論便出來了，已知道從根本上重新研究孫先生大亞洲主義之真精神真面目之所在了，知

道中國必須與日本攜手，纔能內則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外則同負保障東亞之責任了，這也不能不說是和平運動的一大進展。

根據了以上事實，我們相信，我們熱烈相信，和平運動的理論，已經成熟，和平運動的成功，必然到來，目前所餘的問題，只是和平原則如何纔能具體實現？和平方案如何纔能完成？這些問題固然重要。但是我們如果本着十二分自信和互信的決心，提出十二分的勇氣來進行，則一切困難，必可衝破，一切荆棘必可掃除。

我如今還有幾句話，對主張『抗戰到底』『最後勝利』的諸君說，諸君這些話，不是老實話，『最後勝利』是渺茫的，諸君自己心裏知道；先就國際形勢來說，諸君以前聽了陣線論的話，以爲反侵略陣線與侵略陣線必然決戰，決戰的結果，反侵略陣線必然勝利，勝利的結果，必然援助中國制裁日本，所以中國只要抗戰到底，必然最後勝利，這種渺茫的論據，我們在一年以前，不知把他駁過多少次了。至於歐戰發生，則事實證明，再用不着我們來駁了，被諸

君認爲反侵略陣線領袖的蘇聯，已經和被諸君認爲侵略陣線領袖的德國，聯合起來，夾攻波蘭，并且由蘇聯單獨向芬蘭進攻了。諸君所假定的侵略陣線反侵略陣線，已經因粉碎而空虛了。在這時候，歐洲的交戰國家，都是爲自己着想，談不到援助別人，其對於中日戰事，將看日本對於歐戰的態度如何，如果日本傾向自己方面呢，自然盼望中日早早和好，俾日本得以全力來幫助他戰勝他的敵人，如果日本還沒有決定呢，則最好中日兵連禍結，無解無休，至少予日本以牽制，使之沒有餘力，傾向到他的敵人方面去，這種心事，是顯然的，所謂各爲其國，本來不足爲奇。然則諸君所假定的援助，豈不又陷於空虛嗎？還有一層：現在歐洲的交戰國家，誰是將來的戰勝者？誰是將來的戰敗者？目前雖然有種種揣測，但是那裏說得定呢。就軍事說：或者以爲某方面海軍力優，某方面潛艇力優，空軍力優，就經濟說：或者以爲某方面能持久，某方面不能持久。這些在目前雖可以揣測，而在將來則不可以揣測的。例如上次歐戰，俄國的革命，德國的革命，雖然可以從歷史的趨勢上，斷定其可能，然而

是否必然發生，及何時發生，則誰人也不能斷定。然則諸君所假定的戰勝者，豈不又是渺茫嗎？即使如諸君所假定將來的戰勝者屬於諸君所盼望的方面了，然而那便斷得定援助中國嗎？例如上次歐戰結果，巴黎和會，中國是何等的失望，而華盛頓會議，也不過替九一八事變種下一個根子便了，試問於中國有何益處？然則諸君所假定的援助，又是渺茫了，諸君只要把以上層層想過一遍，便可知道抗戰到底最後勝利寄託於國際援助，是如何的渺茫？這是不是忠於謀國者所宜出呢？再就國內形勢來說：這一年來，又喪了多少師，失了多少地，說起來固然傷心，而最可傷心者，還莫過於鋪張小勝掩飾大敗，小勝不是決定的勝利，用不着鋪張的，何況鋪張起來，以圖欺騙人民，其心更不可問呢！大規模的反攻，不用說了，而焦土游擊戰，極其作用，不過騷擾，須知騷擾事小，消耗事大，國力源於民力，民力耗盡，國力隨之，這豈是抗戰到底的辦法，最後勝利更不待言了。共匪惡毒心腸，不必與言，諸君之中，定然有一部分懷着民族自殺政策的，認定國將亡了，不如舉其一切，同歸於盡，如果國之



亡無可救，我也和諸君一樣，如果國有可救，難道不應該以救國爲先嗎？我們今日要爲救國而死，不要只爲殉國而死！以上國際形勢，國內形勢，我在豔電中已經指出，到了今日，更加證實，中國現在除了和平沒有出路，所餘的只是和平原則能否實現，和平方案能否完成的問題了。我知道有許多人，對於和平是盼望的，但是懷疑着和平原則能實現嗎？和平方案能完成嗎？於是存了一種念頭，以爲目前姑且不說，等到和平原則已經實現，和平方案已經完成，那時候再來贊成和平，亦還不遲，全國裏頭存着這種念頭的人，可以說最多了。做個比方，辛亥以前，有許多人，以爲等到革命成功，再來贊成革命，亦爲未遲，其結果，等到革命成功，再來贊成革命的人，十分之九是破壞革命的，如今又說等到和平成功，再來贊成和平，則其將來爲和平運動的破壞者，可以預決。爲什麼呢？因爲他對於革命，對於和平，根本沒有認識，所以其結果必然如此。辛亥革命，還只是國內的改革，如今的和平運動，如上所述，中國必須與日本攜手，纔能內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外則同負保障東亞之責任，這比之

辛亥革命關係更大，工作更鉅，我們只要認定這是必要的，我們便不顧一切的向前奮鬥，即使一時蹉跌，一時失敗，今日的蹉跌與失敗，即是他日成功的基礎，我們何所用其徘徊瞻顧。有人告訴我道：「你須要得到具體的和平條件，方纔可以做和平運動」這句話，我只承認一半的對，因為具體的和平條件，誠然是必要的，然而具體的和平條件之獲得，有待於和平運動，不但此也，獲得之後，期其實現，也有待於和平運動，具體的和平條件，不會突然發生出來的。總而言之，我對於和平運動，是勇往直前的，如果眼見其成功，固然國家之福，即不幸失敗，亦必爲和平前途留下一些種子，因爲中日兩國如果要共存共榮，終不能不向這路條走的，何妨由我來做這條路上的一顆石子，一粒泥沙。有人說道：『爲抗戰而死不失爲民族英雄，爲和平運動而死，死了還受種種惡名』。哼！請你看看蘆溝橋事變以來，幾千百萬同胞的死屍堆在這裏，你還能有閒心替你自己打算嗎？

末了，我記得一件舊事，我於庚戌三月在北京被捕的時候，警察在我身上

搜出「革命的決心」幾篇文章，問我道：「帶這些文字做什麼？」我答道：「沒有什麼，這些文字，從前以墨寫出來的，如今想以血寫出來」，我今日想起當日和我一同坐飛機出重慶的曾仲鳴同志，及首先勸我離開重慶的沈崧同志，我慚愧我到今日尚在人間，我誓以我所餘的熱血，貢獻於和平運動！

（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 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

汪精衛

總理孫先生告訴我們：『中國革命之成功，有待於日本之諒解』，這句說話意義重大。日本是東亞一個強國，經濟軍事文化著著先進，最近幾十年，可以說無日本則無東亞。中國事事雖然落後，卻是東亞一個地大人衆歷史深長的國家，如果要強盛起來，日本必然要知道中國的強盛就於日本會發生什麼影響，於日本有利呢還是有害。如果有利，日本當然願意中國強盛，願意與中國爲友；如果有害，日本必然要將中國強盛的動機打消了去，決定以中國爲敵。以一個剛剛圖謀強盛的中國來與已經強盛的日本爲敵，勝負之數，不問可知。因爲這樣，中國革命若要成功，必須使日本知道，中國革命之成功，於日本有利，這不是權謀策略的，而是誠意的。怎樣纔能於日本有利呢，中國與日

本外交方針一致，軍事方針一致，更進而根據平等互惠之原則，以謀經濟合作，這樣中國的強盛，便於日本有利而無害。這是不是有損中國主權呢？絕對不是，因為一個國家對於一個國家，因為利害相同而相結合，絕對不是有損主權；這是不是有損第三國正當權益呢？絕對不是，因為中日的結合，為的是共同生存共同發達，並沒有排斥第三國正當權益的意味。

十三年間，孫先生在廣州手定國民政府建國大綱，那時候對於中日關係，是照著以上所述方針進行的。十四年間，孫先生逝世，我繼承遺志，主持國民政府，對於以上所述方針，兢兢業業，不敢少變。十七年間，便不然了，濟南事件為中日關係惡轉的起頭，但是冤仇宜解不宜結，中國此時只宜竭力忍耐，竭力解釋，使中日關係由惡轉而復歸於好轉，不幸當時國民政府計不出此，遂使中日關係由惡轉而更惡轉，由此一直至於九一八事變發生。

我說這話，並非有意責難當時主持國民政府的人，我是一個國民黨員，是一個與國民政府有關係的人，對於這種錯誤，我當然應該分擔責任。不過我要

求讀者知道，我在當時是一個亡命者，是一個被國民政府通緝而飄流海外的人。及至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我回到南京，擔任行政院長，其後又兼外交部長，我提倡『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來矯正當時『反對直接交涉』的論調，在我手裏先後訂定淞滬停戰協定塘沽停戰協定。我當時的用意，仍是本於冤仇宜解不宜結的觀念，想從局部的暫時的安定，進而謀全國的永久的和平。我的主張，四年之間，並未達到，我絕不諉咎於人，我只自認才力不逮，事與願違而已。

但是我必反對一種論調，這種論調就是當時所謂主戰派，試問以一個剛剛圖謀強盛的中國，來與已經強盛的日本爲敵，戰的結果會怎麼樣，這不是以國家及民族爲兒戲嗎？

我當初以爲蔣介石先生與我是同心的，我看了二十年十二月蔣辭國民政府主席職後一篇告誡國人的文字，認爲蔣與我同心，所以誠心誠意來與蔣合作，然而四年之間，我已漸漸的覺得不對了。及至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我於大病

之後，又受了三傷，身體上支持不住，二十五年一年之內，我遠適異國，直至西安事變發生，方纔趕了回來，則情形更加大變了。我當時只能牢牢認定剿共事業決不可中止，因為共產黨是只知有第三國際，不知有中國的，他受了第三國際的祕密命令，將階級鬥爭的招牌收起，將抗日的招牌掛起，利用中國幾年來的民族意識，挑動中日戰爭，這種大當斷斷乎上不得的，我當時的言論方針注意此點，讀者可隨時加以覆按。自從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我對於中日戰事，固然無法阻止，然而沒有一刻不想著轉圜；對於共產黨的陰謀，也沒有一刻不想著抵制他，揭破他。直至最後最後，方纔於十二月十八日離開重慶，二十九日發表和平建議。

我的和平建議，是贊同日本近衛內閣聲明的。我爲什麼贊同呢？我依然是向來一貫的觀念，對於日本冤仇宜解不宜結。打了一年半的仗，日本的國力，中國的民族意識，都已充分表現出來，日本既然聲明，對於中國沒有侵略的野心，而且伸出手來，要求在共同目的之下親密合作，中國爲什麼不也伸出手

來，正如兄弟兩個廝打了一場之後，抱頭大哭，重歸於好？這是何等又悲痛而又歡喜的事？假使蔣能認識這是中國關係已到了一個新時期，毅然決然對於此聲明的大意，表示贊同，則中日和平途徑即可開展；更進而根據所謂三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條件，期於彼此交受其益，則東亞永久和平之基礎，即可確定；此後共同生存共同發達，不難循序而得。不幸蔣不出此，反而用深閉固拒的態度，對付日本的提議，更用極端壓迫摧殘的手段，對付國內黨內的一切和平建議。以此之故，蹉跎半年，大局日益敗壞，不可收拾，這是真可痛惜的！

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項原則，固然在近衛聲明中，方纔輪廓明白，但是數年以前，日本已經有此提議了。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日本有吉大使與蔣會見，曾經提出以三原則為改善中日關係之基礎，蔣表示贊同，并表示無對案。其後忽然翻覆：一則曰，那時是軍事委員長，不是行政院長，所說的話，不能算數；二則曰，那時是以私人資格談話，不是以公式談話；三則曰，所謂贊成者，乃是贊成對於三原則之討論，不是贊成三原則；四則曰，所



謂無對案者，乃對於三原則之實施而言，絕非無條件的贊同；這是二十五年整一年中日交涉反覆停頓之原因，也是二十六年中日衝突終於爆發之原因。我們讀了當時的外交談話紀錄，只有浩歎。及至二十六年十二月至二十七年一月，德國陶德曼大使調停戰事，所述日本政府的和平條件，何嘗不也是三原則？我在『舉一個例』文中，已經說過，不必再述。至於近衛聲明，本其向來一貫的主張，爲系統的敘述，並且於我國顧慮之點，均已加以解釋，例如關於共同防共，因爲我國顧慮以此之故，干涉及於軍事內政，故聲明以日德義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關於經濟提攜，因爲我國顧慮政治糾紛尙未解決，故聲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并聲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佔，亦非欲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之利益，有了這樣鄭重而明白的聲明，則三原則之實行，決無害於中國之自由獨立。不但此也，所謂共同防共及經濟提攜，其主要目的在使共產擾亂與經濟侵略兩大毒害絕跡於東亞，這等責任非常重大，日本既屬望中國分擔這等責任，則中國必須有充分之自由獨立，方能

有分擔此重大責任之能力，自無待言。然則我們贊同此聲明，決不是苟求一日之安，而爲的是東亞的百年大計，然則我們爲何對於此聲明採取深閉固拒的態度？

在蔣統制下的宣傳，動不動說，日本正在以全力滅亡中國，所謂三原則，不過是一種托詞。這種宣傳，實在是不對的：第一，日本若要滅亡中國，則以全力繼續作戰便了，不必有所托詞；第二，三原則的提出，已歷數年，如上所述，自近衛聲明以來，更明顯的定爲國策，全國輿論，已趨一致，何以見得是托詞？第三，中日兩國如果沒有一個共同努力的目標，則因利害衝突之故，勢必至於水火不相容，反之，有了一個共同努力的目標，則利害一致，衝突自然無從發生，這樣的關係重大，如何可以說是托詞？第四，數年以來，中日關係所以不能改善，且日趨於惡劣，係誤於一種循環論，例如日本說：中國排日，是九一八事變的起源，中國說：日本侵略是排日的起源，日本說，中國要拋棄以夷制夷政策，纔能使中日關係好轉，中國說：日本要放棄對於中國的野心，

纔能使中日關係好轉；諸如此類，都是互相期待，互相責備，以致愈弄愈糟，如今有了一個共同努力的目標，以同時着力，先期待自己，然後期待他人，先責備自己，然後責備他人，則進步必然較快，成功必然較易，如此做去，不但使中日過去的糾紛得以解除，現在的戰禍，得以結束及補償，而將來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大道，也可以從此踏了上去。

然則爲什麼一定要拒絕和議而高調繼續抗戰呢？我們必須知道，抗戰以來，軍人和人民都已充分的表示了民族意識，這是不可磨滅的；然而同時我們又必須知道，這種民族意識，如今已被共產黨完全利用了。利用民族意識，在民族意識的掩護之下，來做摧殘民族斷送國家的工作，在共產黨是以爲當然的，因爲他根本就不知道有所謂民族，有所謂國家。他只知道接受了第三國際的命令，要把中國來犧牲，犧牲的地方越大越好，犧牲的人數越多越好，犧牲的時間越長越好。中國固然犧牲個精光，日本也不免要受多少創傷，這在第三國際看來，真個是一舉兩得。何況天從人願，抓着了蔣來做幌子，以盡情發

洩十六年以來『剿共』的仇恨，等到盡情發洩之後，他自然會回到他的第三國際老家去，用不着一些留戀。因為這樣，所以三番幾次得着了恢復和平的機會，偏要說抗戰到底，這就是說中國永遠得不着和平的，非替第三國際犧牲到底不可。總而言之，共產黨的罪愆，浮於義和拳，而為共產黨利用的人，其罪惡又浮於剛毅諸人之上，雖然尚有忠勇的軍隊，忠勇的人民，至多不過如聶士成一般，只能盡自己報國的心事，決不能挽回當前的劫運，不如學劉坤一張之洞之保障東南，李鴻章之挺身入京，在八國聯軍槍桿之下，成立和議，或者還可補救一些。

我覺得今日有兩條路擺在面前：一條是跟着蔣高調繼續抗戰，以蔣現有的兵力，不但不足以抵抗日本，並且不足以控制共產黨，以蔣現有的環境，雖欲不跟着共產黨而不能，這樣下去，只有以整個國家民族跟着蔣為共產黨的犧牲。另一條路是把總理孫先生的遺志重新的闡明起來，重新的實行起來，對於日本，本着冤仇宜解不宜結的根本意識，努力於轉敵為友，第一步恢復中日

和·平·，第·二·步·確·立·東·亞·和·平·。這·兩·條·路·，前·一·條·是·亡·國·滅·種·的·路·，後·一·條·是·復·興·中·國·復·興·東·亞·的·路·，我·決·定·向·復·興·中·國·復·興·東·亞·的·一·條·路·走·，我·決·定·團·結·同·志·並·團·結·全·國·各·黨·各·派·以·及·無·黨·無·派·有·志·之·士·，來·共·同·走·上·這·一·條·路·。

（二十八年七月九日）

# 怎樣實現和平？

汪精衛

各位同胞：如今我在廣州向你們廣播，眼睛裏雖然看不見你們，心神早已和你們在一起的，如今身體也和你們在一起了，說不出的感動，說不出的興奮！

七月九日我曾經廣播一次，題目是『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當時沒有將廣播地點說出來，有些自命高調的人，說我定然淪陷了的地方失了自由了。我如今告訴各位，我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發表和平建議之後，沒有離河內一步，我當時實在盼望蔣介石肯替國家民族着想，接受我的建議。等了幾個月，知道這盼望是徒然的，可是國家民族不能不救，於是開始奔走。當奔走的時候，我沒有通知藍衣社的義務，自然只好把行跡祕密起來，不

但當時如此，以後如有必要也是如此，如今我第一句要問的：我爲什麼不可以走到淪陷了的地方？須知道在戰時一個人所能站着的地方，不外以下幾種：一是前方，一是後方，一是淪陷了的地方，一是外國。可是中國人呢，卻多了兩種：一是租界，如上海、天津等；一是外國的殖民地，如河內、香港等。我並沒有鄙夷住在這兩種地方的人，我以爲只要看他的目的和他的言論行動。如果他的目的和他的言論行動，時時刻刻是替前方後方及淪陷了的地方的民衆着想，時時刻刻想去解救，那麼他的努力，毫無分別。如果他以爲現在托庇在外國帝國主義勢力之下，站在風涼地方來說風涼話，我自然鄙夷他。

在前方後方的民衆心事是怎樣的呢？如果和平沒有希望，同歸於盡，無可說的；如果和平有了希望，和平的條件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爲什麼不可以講和平？然而在蔣介石及共產黨壓迫之下，『講和平的是漢奸』，這些民衆，只有在壓迫之下，一聲不響，由他擺佈，至死爲止。我們想到這裏，只有用盡方法，把這些前方後方的民衆解放出來。

至於在淪陷了的地方的民衆呢，他們心神，與前方後方的民衆，是不可分的，不但心神如此身體也是如此，所謂生則同生，死則同死。如果和平沒有希望，同歸於盡，無可說的。如果和平有了希望，和平的條件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他們當然講和平，並且熱烈的追求着怎樣實現和平。

就廣州來說，在去年十月以前，民衆所聽到的是當局叫人民安心，日本軍隊斷斷不能來到，直至十月初旬。還是如此說。及至日本軍隊將要來了。當局帶領軍隊先走，將民衆丟下，而臨走時候，還要放一把火，把民居商店燒個精光，這是廣州民衆處在前方後方地位的時候所身受的，至於丟剩了燒剩了的，在當局看來，只有恨他死不盡，燒不光，還不斷的唆使土匪，用游擊的名義來繼續焚燒搶掠的工作；這是廣州民衆處在淪陷地位的時候所身受的。當局什麼爲如此呢？是奉蔣介石的命令。蔣介石爲什麼如此呢？是奉共產黨的教條。試問這些犧牲有得到一點代價沒有？當初燒的時候，日本軍隊不會因此而不來；燒了之後日本軍隊來了也不會因此站不住。試問這一場燒，除了燒死人



民，燒絕了人民生命所寄託的財產，還有其他什麼意義？！廣州燒了還不算，武漢臨去的時候，也照樣的一道命令要燒個精光。因為奉令的人於心不忍，燒得不甚徹底，因此索性長沙於未去以前，就徹底的燒個精光了！未來的重慶成都，也是如此。而且除了這樣的大燒特燒之外，還要帶着游擊隊零零碎碎的燒，要使全國都變成瓦礫，變成灰燼。如果和平沒有希望，同歸於盡，無可說的，如果和平有了希望，而且和平的條件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為什麼一定要把民衆趕上了死絕的路上去？！這些呼聲，在前方後方的民衆被箝着口發不出來；可是在淪陷了的地方的民衆，卻已發現出來了。我為什麼走到陷淪了的地方來？我是爲這種呼聲所召喚，我要將這種呼聲與前方後方被箝着口發不出來的呼聲連結在一起！

我第二句要問的是：爲什麼我走到陷淪了的地方便會失了自由，我既然下了決心，走到這地方來，難道連『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道理也不懂得？我只會死，絕不會失却自由。不但此也，我時時刻刻準備着以我的生命換

取同胞的生命，以我的自由，換取同胞的自由。

以上兩句要問的話已問完了，如今要說的是怎樣實現和平？這似乎很繁複，其實很簡單。只要蔣介石看得國家民族比他個人重些，遵守孫先生大亞洲主義的遺教，接受日本關於和平的聲明，那麼全國停戰，立即可以實現，跟着和平談判，就可開始。在和平談判中商量各種問題，如善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等，都根據原則以謀具體條件之折衷至當，於是全國所渴想的撤兵，必可以做到。試問這樣，豈不是一件極簡單的事？

但是蔣介石，既然看得他個人的利益大於國家民族的利益，甯可將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獻給受第三國際指揮的共產黨，以爲西安事變替他個人救苦救難之酬勞品。明明白白和平有了希望，而且這和平明明白白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他偏要悍然不顧的加以反對。這樣一來，和平的實現，便遇着極大的阻礙了。

然而要除去這極大的阻礙也有方法，而且這方法並不繁複，實在簡單得

很。只要在前方後方的行政當局，以及帶着軍隊的人，明白了和平有了希望，而且這和平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破除了蔣介石的欺騙宣傳，擺脫了蔣介石的箝制力量，第一步公開的贊成和平，在自己力量所及之地，肅清共產黨的一切陰謀罪惡，保衛地方的治安，保衛人民生命自由財產的安全；第二步將贊成和平的聯合起來，公開的要求蔣介石以國家民族爲重，不再做和平的阻礙。這樣和平的實現，在短期間內，必然普遍全國。由和平實現而得回獨立自由，由得回獨立自由而奠定了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基礎。復興中國，復興東亞，必由於此。

或者有人會提出疑問道：假使我們有這樣的表示，而日本軍隊仍然進攻，那麼，不但和平會成泡影，而且徒然懈怠了軍心，散亂了人心，豈不爲害甚大呢？我如今鄭重的明白的答復道，如果前方後方的行政當局，以及帶着軍隊的人，能有贊成和平的表示，反共的表示，則日本軍隊必不會進攻。因爲日本政府，已有聲明在前，盼望中國有同憂具眼之士出而收拾時局，以復興中國，以

進而分擔復興東亞的責任。因此，日本軍隊，決不會向着我們和平反共的地方及軍隊進攻的。現在我在廣州與安藤最高指揮官會晤，關於怎樣實現和平，彼此互相披瀝誠意。其結果使我確信，如果廣東方面的中國軍隊，有和平反共的表示，安藤最高指揮官，必能以極友好的考慮實現以下幾件事：即是不僅對於這種軍隊立刻停止攻擊，而且更進一步將日本軍隊已經佔據的地方，所有治安警備，以及行政經濟，都從日本軍隊手裏，次第交還中國。因此我今日敢公開約束：如果廣東方面的行政當局和軍隊，能贊成我的和平主張，則我必能得安藤最高指揮官的同意，先在廣東做起部分的停戰，而以次及於全國，使全國和平得以完全恢復。尤其是對於廣州市民，我敢說在最短期間，必能以廣州市還之廣州市民之手，使廣州市成爲比較去年十月以前更有秩序，更有幸福的地方。

各位同胞：聽到了我這篇廣播之後，可以知道我所謂和平可以實現，而且和平的條件，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不是一種空想，而是早晚可以證明的事

實。各位同胞：你們不是淪陷了的地方的民衆啊！你們從前曾經盡了前方後方的責任，忍受許多痛苦許多的犧牲，及至蔣介石將你們丟了之後，還要加你們以種種惡名，恨你們死不盡，燒不光。加你們以種種惡名，好將你們繼續的燒，繼續的送往死路。蔣介石不是以日本爲敵，是以中華民國的衆民爲敵！蔣介石在今日已爲和平之唯一阻礙者，你們只有將這阻礙除去，你們必然能洗卻了種種惡名，而重新做中國復興之柱石，進而做東亞復興之柱石。

各位同胞：我知道我廣播了一篇談話之後，蔣介石必然逼迫各前方後方的行政當局，以及帶着軍隊的人發出聯名通電來攻擊我，但我知道這是無效的。只要和平條件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而且可以爲復興之基礎，我相信沒有一個人能阻礙和平之實現！

（二十八年八月九日）

# 中日和平的基礎

褚民誼

中日戰爭之必須結束，在現今兩國人民之間，是已充滿着此種信念。東亞和平之必須奠定，在現今兩國的政治家間，是已認識其重要性。

我們認爲中日戰爭的結束，並不因爲日本軍事上已經勝利而望和，使之適應此次歐戰中的國際形勢。也並不因爲中國戰敗而求和，使之暫表屈服而準備再度的報復。如果是那樣的話，不但我們決不會主張和平，或許日本也不需要和平。因爲若以前者的說法，日本未曾以二年多戰爭的經驗而認識滅亡中國的不可能性，若以後者的說法，則沒有正確估計中國民族的創造性，和中國數千年歷史維繫的要素。所以中日和平的真實目的，是在奠定東亞永久的和平，進

而求世界永久的和平。換言之，結束中日戰事不是勝敗的結果，而在期求東亞以及求世界和平之實現，必以中日和平為基礎這一觀點上。

我們深深的覺得，這次中日戰爭的原因，雖然很複雜，但兩國間都有一種傳統思想的錯誤。以軍備來說，因為日本是島國，故需要強大的海軍，正和英國需有強大海軍同樣的理由。但日本陸軍的軍備似在國防需要之上，我們試看英國海陸軍力的比例和日本海陸軍力的比例是適成相反，這就使人明白，為什麼日本的陸軍力如此的強大呢？在中國方面看來是日本完全在準備侵略，同時以近世中日關係史上看，確也不少證明日本以軍事劫奪的行爲。但中國不特沒有海軍即陸軍也沒有良好設備，這樣形勢的結果造成了中國人民『畏日』和『仇日』的心理。其次，以政治經濟來說，日本自維新以後，政治和經濟的進步，一日千里而堪與歐美比擬，無疑的是中國的先進。在客觀上，中國政治經濟的改革，因為地理的關係必然以通過日本來吸收為較易，但事實上日本確利用強制性的條約來企圖達到此目的，而這些條約又是以壓力來形成。（如二十一條

等。〕這樣，不但使中國感覺惡劣，而且使國際爲之不安。其結果，中國政治經濟的改革非但不通過日本，反而厭談中日政治經濟的合作。再次，以文化教育來說，日本是以吸收中國古代文化而介維新以成歐西文化的先進，其教育制度，因種族，文字的關係，理應易於達到一致，但事實上，日本的教育是以侵華，侮華爲其目的，未曾致力於中日文化教育的溝通，這樣的結果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站在反對帝國主義的立場，並以抵抗侵略爲其教育的目標。

我們認爲中日兩國，無論在種族上，地理上，歷史上，其政治文化經濟都容易溝通和合作，兩國的繁榮和兩國的和平也很易確立。但爲了中日最近種種的關係，例如上面所述，竟爲兩國和平的障礙。我們雖不信這些是兩國人民間的真意，也不能信爲兩國政治家的真意。至少我們可以說，日本過去在形式上是用強力而沒有真誠使中國人民了解。不然，中國決不會被迫而採取遠交近攻的政策，同時中國人民也決不致有非準備武力不足以抵抗侵略的偏激觀點。

現在經過二年多的戰爭，大家已覺悟過來了。在日本方面，知道即使滅亡



中國也不能維持東亞和平，認識了中華民族之不可侮，所以有近衛聲明且以之昭告於世界。在中國方面，也知道了遠交近攻政策是不足以解決中日問題，同時也認識日本的國力，是有助於中國的建設，所以有中國國民黨汪主席豔電之響應。不但如此，中日兩國又認識了唯平等的友好的和平，才能支持東亞的繁榮而不受國際動盪的影響或漩渦。

我國以爲東亞和平的責任是應由中日兩國來分担，這基礎才能鞏固。的確，中國現在的國力是不充實的，我們希望由於日本的協助，使中國自身得以建設而且有利於日本，以中國的地大物博和人口衆多，不愁不能分担這重大的責任。不過，由於中日最近三十年間的不良關係，應如何使兩國能彼此互信？我們確認，第一，必須放棄以武力征服或武力復仇的觀念，只有在分担奠定東亞永久和平的觀點上，中日各自充實國防，不以之作彼此相爭的工具。第二，我們必須以兩國彼此有利的情形下，建設整個繁榮東亞的經濟合作，以之避免彼此獨佔的形勢。第三，我們必須基本的溝通兩國固有的文化和改善教育制度，

然後兩國的傳統思想得以打破，兩國人民因思想的融和而一致。這樣，東亞永久和平得以確立，世界和平才有曙光。

# 怎樣獲得和平

陶希聖

在三年前，自己爲日本評論寫過一篇論文。在這論文的開頭，我引用了史記中的一個故事。一個是陳勝，吳廣起兵的時候，他們說：「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死等，死國可乎。」（史記陳涉世家）另一個是韓信以背水陣同趙作戰的時候，他這樣說：「陷之死地而後生。」（史記淮陰侯列傳）在這論文的結尾，我又引了卞莊子刺虎的故事，他說「兩虎相鬥，大者傷，小者死。」這論文是表現了當時的中國人的心理。中國人不能戰，然中國不戰，則歸於滅亡，故不辭一戰。然而戰了的結果就不免小者死而大者傷的。

當時，中國的知識階級，正在爭論着岳飛與秦檜的是非。他們把秦檜作爲和平論者，岳飛作爲主戰論者。當時我的見解，反對不戰，然也反對濫戰（浪

戰)。自己的見解是備戰而避戰。我並不同情秦檜，亦不同情賈似道。還是同情於葉適。葉適是主張充實國防而反對濫戰的。當時，我正執筆於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第四冊，從宋代到明朝的一個部分，在南宋的學者間，自己是最推許葉適的一派，那是從我自己心裏所表現的。

今日，中國的抗戰，已進至第三個年頭了。「小者死，大者傷」的故事，悲痛地演出於東亞兩大民族之間。在中國的知識階級之中，除了共產黨，人民陣綫（今日人民陣綫已失敗，僅有德蘇戰綫）之外，皆知中國已不能再戰，他們任何一個都知道這戰敗已不能恢復。他們知道外國的援助是不可靠的。何況歐洲大戰爆發，他們更明白外國的援助是不會來了。總之，已知道中國是不能再戰。

從前年的七月七日到南京陷落，南京陷落到徐州失陷，以及武漢，廣東的敗退爲止，中國的知識分子，朝夕在盼望着戰爭的終結。然中國是『八股文』或是『試帖』流行千年之久的國家，在知識階級間具有附和雷同，追隨時尙的

習慣。他們所寫的文章，都是千篇一律地呼號着抗戰。然而他們如果閉門自省，那就會深知不可繼續抗戰了。自己是從南京到武漢，從武漢到重慶，從重慶到成都，從成都到昆明，可是到處聽到那些有思想，有見識的知識階級的友人，總是有着這一種切實的認識的。

自己的主張，也不是在一般知識階級的圈外。我是主張和議的。我指摘國外援助的不可靠。我更指摘所謂國際和平陣線，全是蘇聯欺騙的口實。我又反對共產黨與人民陣線（德蘇陣線）的理論。這是說大戰剛像是一個爆竹似的，一旦見到開戰，那末英、法、蘇一定要擊破日、德、意的。可是現在英法同德國開戰了，蘇聯到那裏去了，意大利怎樣？美國又是怎樣？

我借日本評論的一角紙，想來述說一點中國知識階級的心理。中國的知識分子，早已深知不能再戰，知道在中日之間，應該趕快結束戰爭。然而中日之間要獲得和平，依然是一樁困難的事情。

現在已豎起和平運動的旗幟來了。抗戰的『八股』與『試帖』的魔力，既

已衰落。迷惑於抗戰的『八股』與『試帖』的人們，已拋棄了『八股』與『試帖』的指導而公然與和平運動攜手了。然而還有一部分的知识分子，現在是在四川、雲南、貴州、陝西、不是不想來日軍的占領地域，更是在日軍的占領地域，一面還想去四川、雲南、貴州、陝西的這究竟是怎樣的現象呢？

第一，我們不應該抹殺這種現象。完全抹殺問題，則問題難於解決。譬如解決數學的命題，如果我們不清楚地判別牠，不追究牠而放任着，那末永久不能解決牠的，這是同樣的理由。

第二，我們不能輕視這種現象。我們一定會想到知識階級在現實上是沒有力量的。然而應該明白知識階級有兩個資格。一是知識分子是人民的一部分。人民所有的觀念知識分子也有的，反之知識分子所有的觀念，會影響人民，會使他們追隨。

在這樣的知識分子的心理，我們一定要知道牠有一個最大的原則存在。這就是民族主義與國家思想。兩年來的戰爭是担負着民族與國家的生命的。他們

雖明知戰而大敗，然而仍是接二連三地支持着這個戰爭。他們知道戰敗的結果是不得和平。然而和平了，能夠保持民族與國家的生命麼。這是他們心中的第一個大疑問，這個第一個疑問，同時也是最終的疑問。

民族國家，必要有獨立的主權與行政。

民族國家，必要有獨立的軍隊與警察。

民族國家一定要有獨立自主的思想與文化。

他們對於領土的完整，當然非常留意。然而他們知道東三省與熱河是不能收回的。知道是軍事手段，外交手段，都不能收回。他們這種戀戀的心理是可能斷絕的。然而中國本部(China Proper)在和平以後，對於主權，行政，軍事，思想文化是獨立自主的麼？

他們受了西洋民族國家的影響。他們知道戰勝國有戰勝國的權利，戰敗國有戰敗國的義務。他們更知道中日兩國進行和平交涉，中國不得不忍受種種的條件。然而他們希望條件是明白的，具體的確定的，是保留中國民族國家的獨

立自主的。

這是他們的希望。如果他們對於條件及其實行，一有懷疑的念頭，那末即使想和平，可也不敢主張和議罷。所以他們是陷於矛盾的境遇。他們一方面是明知『戰是不應戰。』而在他方面却考慮着『和也不敢和。』

重慶的國民政府，就是站在這種矛盾的心理上面。日本要想結束戰爭，想要獲得東亞兩大民族的和平，那末總得先要了解中國知識分子上述的那種心理。在這裏，我自己再分理論，方法，事實的三者來說明一下。

一、從理論上說來，那麼根據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近衛聲明，日本尊重中國的主權與行政，也不求中國的領土與賠償。依據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汪兆銘先生通電的聲明，那末日本如果撤退在華軍隊，放棄侮蔑中國的思想，那麼這個原則，決不是亡國的條件。所以在理論上，中國可以接受日本的提議，中國在跟日本共同的原則與目標上，可以分担東亞和平的責任。

從中國方面說來，在戰敗了的今日，除了忍受日本以戰勝國的地位所提出



來的條件之外，是沒有其他方法的。然而日本不以戰勝國自任，依然是尊重中國的主權，行政，乃至領土。在理論上，中國是可以和平的了，可是中國的知識階級爲什麼還有着疑惑呢？

二、從最後的方法以及事實的兩方面說來，在方法上，日本尊重中國的主權，行政乃至領土的真意，對中國人的心理上的傳達方法不適合。日本方面的某種名詞及其解釋，往往是掩蔽尊重中國的主權，行政乃至領土的真意。譬如『東亞協同體』的一句話，容許有各種的解釋，假使『東亞協同體』如果是說東亞諸獨立國站於平等的地位而互相地求得合作，和平，安全，與發達，那末這句話及其解釋，是不會引起中國人的疑惑的。然而這句話一被誤解，如果被指爲中國失却了獨立的地位與平等的資格，那麼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一定是抱着絕大的懷疑的。因爲引起了這種誤解，所以無論如何主張中日兩國今後構成 *Gesellschaft* (集合社會) 或是 *Gemeinschaft* (共同社會) 然不能消滅任何一個中國人的懷疑心理。

中國在今日之下的情形，與日本講和而合作，那譬如一個窮人跟富人交際合作一樣的。有錢的人往往不懂得窮人的心理，如果在理論上，原則是兩位一體，那麼想來是對窮人方面有利的。然而在窮人方面說起來，過着獨立的生活，而另外獲得富人的諒解與容認，那是值得感謝，然而不希望加入富者的家族。因為恐怕一入富人的家族，就有化爲奴隸的恐怖。剛像是法律學上的所謂『夫婦一體主義』似的，所謂『一體』，是結構的意思，可是在現代的妻子看來，是消失了人格而有變爲丈夫的附庸的恐怖一樣。日本如果能夠理解中國人的懷疑心理，那麼對於在技術與方法上，如何傳達日本的真意這一點，還希望加以研究。

三、其次是事實。在現在的中國，有主戰與和平的兩大潮流。前面已經說過了，在主戰的潮流之中，對於和平的希望同樣地切迫着的，而主戰潮流存在着的原因之一，就是有了上述似的懷疑心。

在和平的潮流之中，一般相信日本的真意，像在近衛聲明裏指摘似的。然

在和平與主戰的潮流之中，任何一個都要獲得『只有事實』證明中國的獨立平等，所以在期待着爲和平而並不喪失這些事情的事實的證明。

事實的期待，終於失望麼？或者終於滿足麼？然而事實的發展，如果是中國的主權，行政的獨立以及思想的獨立自主，得以證明爲和平而並不喪失這些事情。那麼主戰的潮流，必然會完全消滅。如果中國人對於這一點，可能使渠抱有多少的擔心，那麼主戰的潮流，即使結局是消滅的，然而一時間也不容易消滅的罷。

中國人的希望，決不是極大極高。中國人絕不否認日本今後在東亞的優越的地位，日本今後在中國的優越的地位。中國人是希望在『事實』上證明了中國是保持着一個獨立的國家，獨立的民族，以及獨立的思想文化。

獲得了和平之後，中國怕決不會再想與日本戰爭。中國人經過抗戰之後，知道了戰事隨便開始，却不應任意思持。中國今後不得不獲得百年的和平，至少是一代的和平。獲得了和平之後，中國的民族思想，必定會轉脚着地了，變

爲了尊重科學，崇尚現實的傾向了罷。今後的中國民族思想，決不是受惑於大言壯語，美辭麗句而遭受禍害了罷。

獨·立·自·主·，那·麼·和·平·是·容·易·獲·得·的·。否·則·，中·國·人·依·然·是·夢·想·着·『遠·交·近·攻』，幻·想·着·國·外·的·援·助·，如·此·，則·中·國·的·社·會·，政·治·與·經·濟·，決·不·能·恢·復·其·和·平·與·秩·序·的·。

這許多話，全是中國知識階級的內心中的話。我是知道他們的內心是有這一種的思想。所以我自己想率直坦白地對日本人士，把牠寫了下來。

# 和平運動之目的與手段

陶希聖

我們不斷的指出：和平運動的目的，在於軍事復員，社會安全，經濟恢復與繁榮，使中國為主權行政完整的獨立國家，以分擔東亞和平的責任。現在我們不憚詞費，把這一句話分成三點來說明一下。

第一，和平運動的目的之一，在於寢息兵戎，恢復安定。中日兩國的和平，以兩國息兵停戰為第一任務，以兩國息兵停戰為第一步驟。這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高調的亡國主義者，要把日本軍隊打出中國以外還不肯言和。這明明是虛偽的誇大的宣傳，其目的在打倒國民黨國民政府，以實現『吃砒霜來毒老虎』的蘇俄遠東外交政策與陰謀。凡是中國人，以中國國民的立場，替中國找出路和活路，決不會聽取這樣的宣傳和煽動。除了這一派陰謀家以外，大家總可以看出和平運動的必要，而和平運動以息兵停戰為第一任務和第一步驟。

息兵停戰的方法雖可以由局部作起，但是我們早已不斷的指出：我們的和，是全面的和。我們的和平運動決不以局部的息兵停戰爲止境，更不會以停頓在淪陷區的政治設施爲止境。這樣的止境，將使和不過支離破碎的和，使中國陷於支離破碎的境遇。我們要糾正這樣的錯誤，而向前邁進於全面和平的目的。

第二，和平運動的目的之二，在於澈底解決中日之間的各種問題。本來中日之間各種問題，有三種解決的方式。一個是中國全勝，不獨全勝於國境之內，並且強迫日本作城下之盟。這時候中國獲得一切而日本退讓一切。這是一個澈底解決中日問題的方式。這個方式是白日的夢話，半夜的幻想。這種夢話和幻想只有共產黨和盲目的英雄主義者才說得出來，更沒有人能夠相信。一個是日本全面征服中國，這時候中日之間的一切問題也就解決了，無須和平談判，也沒有和平條約。這在今天，是不可能的。便是日本的有識之士也承認其不可能。這兩樣澈底解決中日問題的方式都不可能，只有第三個方式，即中日之間

以和平談判解決一切問題的方式。

這個和平解決中日問題的方式，有一個基本的條件。這個基本條件就是中國主權行政的獨立與完整。假如中國在和平談判之中，喪失了主權行政的獨立與完整，中國的國民必不肯爲。中國國民認爲抗戰足以亡國，因此主和。中國國民如看出和平也足以亡國，必不肯和。既不能戰，又不肯和，只有陷中國與日本於兩敗俱傷的境遇，至少也要重演卞莊子的老話，『小者死，大者傷。』因之，我們要向中日兩國有識者指出，中日和平的取得，以中國主權行政的獨立與完整爲基本條件。

這個和平解決中日問題的方式，又有一個基本的癥結。這個基本癥結就在於中日經濟合作的具體方法。中國政治的基礎在於經濟，兩國之間的問題的基礎也在於經濟，假如中國不能保持獨立的經濟行政，假如中國不能自力更生於經濟的領域，則和平等於空談，而民族趨於死滅。中國國民深知戰敗國不能不忍受苛酷的條件，惟須這條條件不至於連根拔倒立國的基礎，並且不至於一棒打

殺復興的機能。同時日本的有識者也深知中日經濟共存的必要，不以戰勝國自居，以榨取中國使其不能自存。兩國之間平等互惠的經濟合作，在理論上已不成問題。問題乃在於具體方案的確立，與具體事實的糾正。

由於上述兩點，我們可以知道和平運動任務的重大，工作的繁難。我們已經說過，戰難和亦不易。我們甚至於可以說，戰難和更難。

第三，和平運動的目的之三，在於以中日兩國共存爲基點以奠定東亞永久和平。東亞永久和平是東亞兩大民族的理想。在日本，提出『東亞新秩序』的名詞。在中國，提出『大亞洲主義』的理論。這些都是以東亞永久和平如何取得爲問題，而尋求解答。但是，中國現在是外則敗亡之餘，內則共禍未息。中國當前的要求，並沒有這樣的遠大。中國的國民急切的要求，在中國最低限度的獨立與自主。中國的獨立自主取得以後，才有分擔東亞和平的責任的地位。

和平運動的目的是這樣的切實，這樣的艱辛，這樣的遼遠。在和平運動目的到達的途中，決沒有苟安的隙地，也決沒有止息的階梯。或者有人以爲我們



的和平運動的目的在於成立中央政府。或者認定中央政府的成立是和平運動中途的一個止息的階梯，一個苟安的隙地。我們要鄭重的告訴他們，這種認識是錯誤的。

我們要鄭重指出，國民政府的改組與還都，不過是和平運動的一手段，一方法。爲了和平運動的開展，這個手段與方法是必須使用的。但是，我們指出：如果國民政府的改組與還都，不能有益於和平運動，我們決不肯爲。我們很簡捷了當的喚起國人的注意，我們的主張是『戰則全面戰，和則全面和。』爲達到全面和平的目的，我們要實行三民主義，恢復中國國民黨。爲達到全面和平的目的，我們要本於三民主義的精神，嚴守中國國民黨的法統，而改組國民政府。在這裏我們不憚重複，列舉下面的兩點，加以嚴正的說明：

第一，組府不是最高的目標。組府乃是和平運動促進的一個手段的方法。我們在國破家亡的今日，我們要以和平運動來恢復中國的社會安定，經濟復興，與國家的獨立，民族的生存。在我們的心目之中，那裏會有一點一滴一絲

一毫權位思想？再明白一點說：組府只是爲了復國。國沒有復，政府又從何有權？所以我們堅確認定組府不是最高的目標。我們要懷抱並堅定我們在野的精神。

第二，組府不是最後的階段。很明白的，組府還京以前，要準備人事的條件，要充實實力的基礎，要取得獨立自主的地位。在組府還都以後，更有和平的恢復，國交的調整，經濟問題的解決，各種各樣的重大任務，千頭萬緒的艱難事業。政府成立，當然不是最後的止境。如認定組府是最後的止境，則和平運動必隨政府成立而死滅。隨和平運動的死滅，我們的主張就死滅了。所以我們堅確認定組府不是最後的階段，尤其不是和平運動的止境。

# 中日和平與亞洲前途

胡蘭成

對遠東問題，我們認爲只有從調整中日關係入手，以調整對英美關係，中日和平要這樣纔能實現，東亞的安定要這樣纔能確立。反之，從調整對英美關係入手以調整中日關係，以國際調停來代替直接交涉，我們是認爲不可能的，因爲倘若這樣，遠東外交的圓心便無從求得，中日英美四個勢力相引相拒，將無從形成一個交點了。我們的這種外交見解與主張，在歐戰發生前是如此，從歐戰發生到現在也是如此，將來歐戰展開而爲世界大戰，還是如此的。

中日戰爭是遠東舊均勢的破壞，但破壞得不徹底，這不僅是因爲日本的破壞力有它的限度，而且因爲遠東舊均勢是世界舊均勢的一部份，在世界舊均勢的建築物尙未坍塌以前，遠東舊均勢的建築物雖然首先朽爛了，但地面上還是被這種朽爛的殘餘所佔據，新的建築物無從安排起。

可是這個現狀並非不能改變的。就現狀來說，亞洲只是歐洲的尾巴，遠東事件取決於歐洲事件，歐洲出不得主意，亞洲就只好混亂下去。這樣說起來，實在是可悲的。但亞洲爲什麼要自安於做歐洲的尾巴呢？從前美洲也是做過歐洲的尾巴的，但上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國已知道怎樣把美洲作成一個力量的單位，不再做歐洲的尾巴。怎樣把美洲作成一個力量的單位呢？便是美國的門羅主義，不用以征服美洲諸國家，而用以團結美洲諸國家。上次世界大戰以後，門羅主義展開而爲泛美洲主義，整個美洲大體上已做到軍事外交一致，政治經濟合作，成爲一個協同體。這樣之後，美洲雖還不能代替歐洲的世界地位，但已解除對歐洲的依賴。剩下繼續依賴歐洲的，只有非洲，澳洲，亞洲了。

非洲看來似乎是沒有希望的，澳洲的自主則有待亞洲的自主。亞洲有一個中國尙未完全淪爲殖民地，又有一個日本具有成爲亞洲諸勢力的中心的資格。亞洲能不能從對歐洲的依賴解放出來，問題就在於中日兩國能否合作把亞洲作成一個力量的單位，像美洲那樣。中日兩國的政治家對於這一點，並不是沒有

認識。在中國，有孫先生所倡導和汪先生所遵循的大亞洲主義，在日本，則有所謂東亞協同體。要是亞洲的世界地位，能夠做到美洲的世界地位那樣，不但中日和平能夠自己料理，整個亞洲的民族自決也可以出現了。

亞洲的經濟依存於歐洲的經濟，因而作成亞洲的政治依賴於歐洲的政治。但這種經濟的依存關係是可以變動的，而且現在已經是在變動了，這從政治關係的變動上可以看得出來。現在只是歐洲的政治環境影響到亞洲的政治環境，但歐洲的政治意志已經不能支配亞洲的政治方向了。政治變動是經濟變動的催生婆，中日兩國要是能夠合作替亞洲的政治地位創造出一個新的局面，亞洲的經濟地位也可以得到解放的。

中日兩國合作以復興亞洲，把亞洲作成一個自主的政治單位，經濟單位，這樣，建立遠東新均勢的把握，就在於中日兩國的力量結合，遠東不再是英美之間的緩衝地帶，也不再是夾在日本和英美這三條河流之間的三角洲了。緩衝地帶的存在是人家賦予的，三角洲則隨時會因波流的沖盪而坍塌，消滅。我

們現在絕對不能再來希望在緩衝地帶上在三角洲上建立遠東新均勢。人們往往只知道，中日和平的實現有待於遠東新均勢的出現，却沒有知道從實現中日和平當中去建立遠東新均勢。他們盼望英國出來維持遠東舊均勢，又盼望美國出來創造遠東新均勢，又盼望美國英國與日本共同建立遠東新均勢，而在這種均勢之上取得中日和平。這種盼望，都是在緩衝地帶或三角洲上建立遠東均勢的盼望。他們忘記了把中國這個力量估計在內。他們的盼望都失敗了。

在日本，有着兩種論調。一種論調是看到歐戰起來了，想借重德蘇調停來斷然解決遠東問題，另一種論調是仍然主張借重英美調停來斷然解決遠東問題。其實，德蘇調停或英美調停都是不可能的。德蘇調停之不可能，是因為歐洲的戰局尚在徘徊中，德蘇關係本身現在尚未確定，她們對英美的關係現在也尚未確定，日本又怎能借重這種尚未確定的勢力結合來共同對遠東作斷然的處置？英美調停之不可能，是因為英美在遠東勢力對比之新的確定，現在依然談不到。日本的破壞剝奪了英國的機會，但作成美國的機會還是不夠。美國能否

代替英國來領導，以建立遠東新均勢，只有在二次大戰的結果中纔見分曉。現在是日本勝利得不徹底，英國退却得不徹底，美國進展得不徹底，而在二次大戰來到的前夕，這種不徹底的勢力關係是象徵變動的開始，不是象徵變動的結束，英美日之間依照現在的情勢，要想將就妥協，乃是不可能的。

在中國，重慶政府在期待英美蘇援助抗戰制裁日本失望之後，轉來期待德蘇調停，又來期待英美調停，而現在則集中於期待美日妥協以作成中日和平。十六日孔祥熙發表談話，不再希望美國制裁日本，只希望美國能和日本妥協，其心可說是甚苦的了。然而期待國際調停與期待國際援助，乃是同樣不致有結果的。因為無論是國際援助或國際調停，都需要一個前提，即遠東國際勢力的離合去就已有一個着落，一個中心，纔能幹得出事來，可是現在正缺乏着這個前提。

所以，我們認為在日本只有近衛聲明是準確的，在中國，只有汪先生的主張是準確的，近衛聲明與汪先生的主張就是要以中日兩大勢力的平等結合，以

之為改建遠東勢力的中心，以之為實現和平的基地。這樣做去，亞洲的世界地位可以提高到美洲的世界地位那樣，不再做歐洲的尾巴，倒是可以做歐戰的監督者。大亞洲主義與所謂東亞協同體，和美國的泛美洲主義有不可以相提並論的地方，也有可以相提並論的地方。可以相提並論的地方就是，美國領導推行泛美洲主義，不是征服美洲諸國，而是團結美洲諸國。日本要是想以征服來代替團結，以征服來代替平等的結合，則大亞洲主義或東亞協同體之實現即為不可得。還有一點是，美國並不拿美洲來對歐洲戰爭，而是拿美洲來調整對歐洲的關係，日本要是以為只有和英美大打一場纔能把外來勢力驅逐出歐洲之外，這會是幹不通的。所以我們的主張，是以中日關係的調整引致對英美關係的調整，不是以中日關係的調整來對抗英美，去和英美決鬥。

我們的這種主張，在歐戰發生的前夕，是要趁歐洲勢力在遠東的退却時機，以促成亞洲的解放；在歐戰發生之後，是要趁歐戰尚未確定，因之尚未能對遠東行使其新的影響的時機，先來確定亞洲的世界地位。將來歐戰展開成爲



世界戰爭，我們也只有趕快把亞洲作成一個力量單位，纔能不隨以俱燼。所以中日和平，乃是與亞洲的和平成爲一體的。

（轉載三民周刊）

# 戰由國民黨戰和由國民黨和之事實

## 與理論

曾芝生

歷史是不會錯的，國民黨的產生，完全根據中國近代歷史的條件，她的發展，強大，并進而肩負着整個中國民族國家的命運以向前邁進，均係由中國歷史的條件决定着而非偶然的事情。

中國國民黨的誕生，在海通以後中國已經向次殖民地轉化的時期，所以中國之淪於次殖民地的地位，國民黨不負責任，而欲挽救這次殖民地的命運使成爲近代獨立平等的民族國家却正是她的任務。

次殖民地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是複雜的陳腐的，她所處的國際環境，也極端險惡，而且到處都可以觸着侵略的魔手的。所以國民黨於此，對內要與舊的

封建勢力鬥爭，要與無知的盲動勢力鬥爭，對外又要與侵略的各種勢力鬥爭，在這樣險惡的環境之中，國民黨所遭受的艱辛和挫折，所犧牲的血肉與精神，是人所共睹的事實。自然，在這種困難艱苦的過程中，國民黨有時要犯着黨的路線的錯誤，黨員要犯着個人行動的錯誤，以致影響於社會民衆，也是難免的事實，我們站在黨的立場，承認錯誤并嚴格的加以糾正，同時站在黨的立場，熱望着全國民衆，了解次殖民地內部外部環境之險惡與國民黨所負任務之艱辛，加以廣大的支持與平心的寬恕。

國民黨執政以來，在建設近代民族國家的偉業上，已經有巨大的進步，統一的大業也漸次近於完成，但不幸中日戰爭的爆發，使國民黨在維護民族國家的獨立平等的任務上，不得不挺身作戰，因而建國偉業亦不得不半途遭受挫折，兩年以來的艱苦奮鬥，使民族力量得到得儘量的發揮，使國際上對於中國民族不得不大加敬信，而尤其使敵方上下，亦不得不承認中國民族力量不可屈伏從而要與中國的新生勢力釋嫌言和，這固然是由於民衆的共同努力，但國民

黨的堅強組織和指揮行動，是決定的作用，這種事業，決非國民黨以外的黨和勢力所能擔負。譬如共產黨是自稱爲抗日前衛并要爭取抗日的領導權的，但事實上對於偉大的國民黨的力量，不得不承認，而對於自身，只能在承認國民黨力量的大前提之下，偷偷摸摸的粉飾，所以毛澤東在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報告裏，亦無可奈何地要作這樣的召供：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以國共兩黨爲基礎的，而兩黨中以國民黨爲第一大黨，抗戰的發動與堅持，離開國民黨是不能設想的。國民黨有它的光榮的歷史，主要的是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反對袁世凱，建立過聯俄，聯共，工農政策，舉行了民國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領導着偉大的抗日戰爭，它有三民主義的歷史傳統，有孫中山先生蔣介石先生先後兩個偉大的領袖，有廣大忠忱愛國的黨員，所以這些，都是國人不可忽視的，這些都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

抗戰離開國民黨不能想像。抗戰的責任，只有國民黨才能夠負荷，這完全

是現實客觀的事實，歷史的社會經濟的條件決定着國民黨爲中國唯一支持國運的政黨，平時沒有一個黨可以與他抗衡，戰時也不能有一個新黨的產生可以代替，所以國民黨已取得的法律的政治的地位，始終是穩定而不能動搖的。又國民黨之所以毅然領導抗戰，是完全基於民族國家利益的，所以等到抗戰已有成效，民族國家的利益可以不用戰爭來保障時，國民黨又以毅然決然的態度從事和平運動。并且由和平的倡導進而至於具體的實踐和平救國的工作。在汪先生的領導之下，國民黨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修改黨綱，確定對內對外的大政方針，對內努力民主建設，以奠定民生的基礎，對外和平睦隣，以保障國家民族的平等獨立。這又是在萬分困難的環境之中，國民黨所擔負的一種現實任務。這完全又是由歷史的條件和現實的環境所決定的。事實是這樣：中國既然如前所說只有一個唯一的可以支持中國國運的政黨，在戰前和戰時沒有另一個黨可以代替牠的法律的政治的地位，所以日本要戰，便只能與國民黨戰，不與國民黨戰，中日便沒有戰，要和，便只能與國民黨和，不與國民黨和，便只能

找些毫無社會基礎的私人作傀儡而得不得和的成果，就中國本身而論，國民黨不領導抗戰，中國便只有亡，國民黨不領導議和，抗戰的結果便要流產。中國也只有漫無系列地趨向衰落。這樣，歷史的現實的客觀條件決定了國民黨的任務，國民黨在民族國家利益的大前提之下權宜輕重之後，便都以勇敢的姿態挺身而出了。

## 一一

一般人或者不免要疑心爲什麼像和戰這樣兩個關於國運存亡的大問題，在前後的時期內都要由國民黨來負擔呢？在這裏，我們要以嚴正的態度與社會科學的方法加以闡明，以消釋一班人之驚異，因驚異之消失，進而竭力支持國民黨的立場和行動，國家民族的利益乃可確保。

第一就中國的社會經濟基礎而論，至少在現階段不能有別的政黨可以在法律上政治上取得確定的地位，進而支柱國運，近代的政黨，通常以代表階級的

姿態出現，她所代表的階級的社會經濟勢力澎大，她便可進而以革命的或以漸進的手段，取得法律上政治上的地位，組織政府，對外維護國家利益，對內維護階級利益。歐美有力的政黨大都是資產階級的政黨，以資產階級的基礎支持着黨，黨支柱着國家，革命後的俄國，是無產階級的一黨專政，以無產階級的基礎支持着黨，黨支持着國家，（馬克斯主義是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衝破國家的，斯太林倡導的是一國共產主義，對馬克斯主義是欺騙虛偽，但就客觀現實而論，牠是真實的，所以我說俄國共產黨仍是支持國家的。）但這種事實，在現階段的中國是不能存在的。現階段的中國，是次殖民地的國家。次殖民地國家的特徵，是外國金融資本工商業資本勢力的強大，國家沒有獨立的民族資本和民族工業的基礎，沒有獨立的民族資本家階級，從而也沒有充分的條件可以產生一個強有力的代表民族資本家階級的政黨。有的只是通過外國資本主義國家開設的洋行與其卵育下的行幫買辦階層，這個階層，只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商品與農業國家的原料交換之下的私生子，有損國家民族，而不能代表國

家民族。即其自身，亦不能有堅定的基礎。所以中國客觀的社會經濟條件，沒有發展出強大的民族資本階級，從而也不能有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政黨可以支持國家的命運，這是中國與歐美不同的地方。至於說到無產階級，則更加沒有基礎。馬克斯主義的所謂無產階級是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農民不過居於附從的地位。資本主義社會事實上是工人無產階級的母胎，中國沒有民族工業沒有民族資本主義，這個嬰兒便難長成。資本主義的社會條件，既沒有使無產階級生長成熟，并訓練到可以擔負歷史任務的程度，無產階級便沒有脫胎而出和獨立支柱國運的可能，中國共產黨雖然到處流徙，但實際在中國，牠是找不到馬克斯主義所說的社會基礎的。中國共產黨所推行的并不是馬克斯的共產主義，而是一種左傾的幼稚的盲動主義。中國共產黨的本身，也並不是如馬克斯所指出的產生於都市的工人無產階級基礎之上並代表着無產階級利益的政黨，因為這些條件和基礎，在資本主義沒有發達的次殖民地的中國是並沒有成熟的。所以實際中國共產黨的形成，只是俄國共產黨組織和理論的皮毛與中國貧農階層



的結合。共產黨的組織和理論，完全是外鑠的東西，並無真實的中國社會基礎作其依據，至於貧農階層的存在，秦漢以降，在中國社會史上是長期的存在着。在天災流行兵變頻仍或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苛酷的剝削之下，是常被迫或被利用作無知的暴動的，西漢末的赤眉，黑山，白波，東漢末的黃巾，唐末的叛亂，明末的流寇，都是以窮農作基礎的，這不要思想政策只要在幾個簡單的口號之下或一件宗教的外衣之下就可以領導起來而給予社會以破壞的。這完全是歷史的事實，西漢末的劉盆子，東漢末的張角，唐末的黃巢與王芝仙，明末的李自成與張獻忠，都可以領導。現階段中國共產黨所有的中國社會基礎，仍然是沿襲着上述中國歷史上的東西，而不是馬克斯所指出的近代共產主義的基礎。所以中國共產黨的新的內容，只有外鑠的組織形態和盲動思想，除此便與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暴動了無二致。共產主義是必須建設在極高度的工業基礎之上的，歐美資本主義與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尚未實行共產主義，俄國已行的也不是共產主義，而是採用經濟政策，實行社會主義，所以共產黨之於中國，并

無革命的作用，由於牠的盲動與破壞，使工業落後的中國不得加速地走上工業化的道路，牠的本身倒是革命前途的障礙，這樣的黨，是決不能支持國運而肩負着和戰的大責的。所以事實上，中國社會經濟的客觀條件决定着只有中國國民黨才有這樣的力量，這完全是歷史的任務，無可逃避的現實事件。

## 二一

在這裏，我們要問：爲什麼只有國民黨可以擔負起這種責任？國民黨在什麼基礎之上產生這種力量而又必須擔負着這一歷史的任務呢？

如前所說，現階段的中國不能產生強有力的資產階級的政黨，同時更不能有強有力的無產階級的政黨，中國的現實的條件與客觀環境，需要一個對外能代表全民族國家利益，對內能調和全民族國家利益的政黨，國民黨就是在這樣內外需要的條件之下產生的政黨，牠的所以能夠發達強大并進而在法律上政治上取得唯一的地位的緣故，實即因此。所以就國民黨的本質而論，完全是一個

民族性的政黨。這事實純粹是由中國社會國家的基礎和條件決定着的。我們就下列的兩項來分析，更可證明次殖民的國家必須有民族性的政黨，而一個政黨要在次殖民地成爲唯一強大的政黨也必須具有這種性質。

第一是次殖民地國家內部階級對立的形態不甚顯明，而且沒有一個階級具有特別的力量可以支持國家，如在二節所說的資產的政黨以至無產階級的政黨，都在中國不能取得主導的地位，便是事實。這完全是次殖民地的特殊的歷史的社會經濟的條件所範圍出來的特殊形態。事實上在農村方面，大體只有小地主與佃農貧農的差別，而在外國工業商品之侵略之下，遭受着同樣的命運。都市方面，大體也只有小工廠主與工人，店主與學徒的差別，大部大工廠的經營和資本，都是直接的或間接的操縱於外人之手，所以事實上中國的工人階級是直接和外國資本家階級對立，不但工人，如果不是買辦階級而是民族的小資產階級的話，牠的地位也是和外國資本家階級對立的，一方面由於產業的落後與整個經濟發展的遲鈍，階級的分化沒有明顯，沒有在民族的內部尖銳的對立

起來，另一方面，在對外需要抗禦外國資本主義侵襲的條件之下，各階級又需在民族國家的前提之下，統一起來。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國民黨是由各階級間的有用和知識份子的共同結合而產生的。牠由各階級產生，而不單獨代表各階級利益，次殖民地國家內部各階級的利益既在民族國家的前提之下統一着，國民黨便以挺立的雄姿，代表民族國家利益而從事奮鬥。提倡民族主義，對外要求中國民族的國際地位平等，對內主張各民族一律平等，所以就次殖民地歷史的社會經濟的條件以及國民黨奮鬥的必然目標而論，無疑的，國民黨是民族性的政黨。

第二是次殖民地國家內部階級間的利益衝突沒有尖銳的樹立。這是與上述階級沒有明顯對立的形態互為因果的。不但沒有尖銳的對立，而且就上述對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而言，利益還是一致而且還需要在民族國家的前提之下統一起來，所以在民族國家內部縱有各階級間微弱的利害衝突，然而在民族國家利益的大前提之下，在必須取得民族國家利益才有階級利益的次殖民地的現實客

觀條件之下，各階級的本身不需要單獨有一個黨來爭取各自的利益，而需要一個代表民族國家利益的黨，由各階級的前進和知識份子產生，而又站在各階級之上以調和各階級的利益。因為前者的結果，必然的要損害民族國家的利益，從而自身的階級利益亦不能獲得；而後者，則兩相益而不相礙。結果是調和民族國家利益。在這種客觀要求之下，國民黨又嚴正地以民族性的政黨出現了，她提倡民權主義，主張全民的民主政治，使任何階級任何個人都有政治的工具可以維護他本身的利益，她提倡民生主義，用生理的和平的經濟政策，從事建設，調和各階級的利益，並企圖在生理的和平的建設過程中，有計劃的消滅各種階級間利益所以衝突的因素，並進而消滅階級。所以在現階級，階級利益是由次殖民地客觀條件的規定在民族國家利益的前提之下矛盾地統一起來（這矛盾如以前所論是極微弱的），但到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建設完成之後，階級的利益沒有存在，連階級的本身也不存在，這時便只有民族國家的大融合了。所以就次殖民地內部階級間利益沒有尖銳的對立，客觀環境需要階級利益調和不

需要階級利益衝突，各階級不需要各有黨也不能各有黨來相互鬥爭的諸種事實來考察，就知道只有國民黨才是中國歷史的社會經濟條件的所規定的黨，只有具有民族性的國民黨，才可是擔負着這個歷史的任務。

所以，就各方面的條件來考察，無疑的，本質上，國民黨是一個民族政黨。

#### 四

因為國民黨的本質是如此，而客觀的中國民族國家的外部內部的條件又決定着國民黨的歷史任務，使其不得不艱苦邁進。所以國民黨之成爲中國唯一大黨而必須全力支持着國運，並不是偶然的，是國民黨必然的命運，同時也是中國國家民族必然的命運。無可推委，現在當前的一個問題，是和戰問題，我們知道了國民黨的本質與中國外部內部的客觀事實，便可知道戰由國民黨戰和由國民黨和的一貫的事實和理論了。如前所說：國民黨是民族政黨，對外是爭取

民族國家利益對內是調和民族國家利益的，所以戰可以保全民族國家利益或必須戰來保全民族國家利益時，國民黨便挺身而戰，和可以保全民族國家或必須和來保全國家民族時，國民黨便挺身而和。國民黨只有因時間與外部內部條件的變化而易其政策，決未曾離民族國家利益的大旨，譬如共產黨則不然，抗戰起來，牠極力的要爭領導權，但實際不過盡搖旗吶喊之力，等到抗戰有了成果，需要用和來保障這成果的時候，牠仍在搖旗吶喊的要抗戰，因為本質上牠是一個外鑠的東西，牠不代表民族國家的利益，民族國家殘破或衰亡了，牠仍然可以發展牠的蘇維埃，牠又何樂而不出此呢？所以和戰之於共產黨，便不是民族國家的事情，而只是共產黨利用以發展其自身的工具了。

自從國民黨是有牠過去的錯誤的，我們站在黨的立場，虛心的承認，并力求改正，但國民黨是有牠過去的功勳的，廢除帝制，打倒袁世凱，并摧毀軍閥與封建勢力，這也需要黨外人士平心的承認，一個已經淪於次殖民地的國家民族，整個的國家民族便是極其衰落的，在這個整個衰落的國家民族基礎之上所

產生的黨，自然也不免要陷於微弱。客觀事實的需要，是要在微弱之中求強大，在衰落之中求復興，黨要如此，國家民族也要如此，黨與國家民族相互的目標，也要如此。這一點，我們誠心地盼望全國上下加以深省。

（轉載三民周刊）



# 和平運動的思想主幹

魯畏公

站在主戰的與旁觀的立場，一見主和之士，便指爲是民族失敗主義者，或詈之曰漢奸國賊的，這只是一種淺薄的無知的污蔑。但是站在主和的立場或真正從事和平運動的人如果在和平運動的進程中放棄自身的立場，則將真如淺薄無知者的污蔑，要自投絕境的。淺薄無知者的污蔑固不值一顧，但怯懦者的言和，亦應嚴格地加以挫擊，過去在戰爭無法可以避免的時候，我們極力地鼓勵戰爭，但自去年以來，戰爭已至可能結果的時候，我們便極力地提倡和平。我們認爲：爲着國家民族的利益主戰，爲着國家民族的利害言和，這是任何人應有的權利，在民主政治已經樹立了任何國度裏，這種權利是隨時隨地可以有的。所以不怕任何種的污蔑，我們要明目張膽地主和，在這裏我更要揭出我們所懷抱的幾個根本立場和思想，以與國人共見。

第一是民族的立場和民族思想，這種立場和思想，處于一被壓迫地位的民族裏面，是絕對地需要保持的。因為已經處於強大地位的民族如果加強并擴大這種立場和思想，事實上將成爲向外侵略的動力，但在被壓迫的民族裏面，這種立場和思想的堅定與發揚，便具有一種正當的合理的作用。這並不是說，要堅定并擴大民族的立場和思想，使被壓迫的民族進而爲壓迫的民族，而是要使被壓迫的民族力量可以解放自身，可以取得與他民族對等的權利與待遇。中國的民族是被壓迫的民族，是遭遇着國際地位不平等待遇的民族，不論以何種方式與何種途徑，而欲求取中國民族對外之獨立平等，却是全民族的自然願望與共同目標，所以民族至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就現階段中國民族的客觀環境而論，是真實正確的認識。我們站在和平的立場，所採取的策略雖然與主戰者異趨，但這種立場和思想，我們只有使其加強堅定使其發揚深沉，而決不能稍有減縮的。

第二是國家的立場和思想，在半殖民地國家而又處於向完全殖民地轉化的

危機中，加強國家的政權，保持國家的統一，是一種前進的建國任務。中國社會的形態，現時沒有階級的明顯對立，所以中國國家的本質，不是如馬克斯恩格斯兩氏所指出的，是強有力的經濟上居於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半殖民地  
的現實客觀條件，決定着她對外要代表全民族利益，對內要代表全國民利益，而我們的責任，便是要促進她健全她使她有力量可以擔負這種任務。所以現階段的實際工作，對外是爭取國家行政領土的完整國防軍事經濟等建設的自由，對內第一是要打倒以階級鬥爭或以其他盲目行動來破壞國家的黨派和思想，第二是要糾正完全委曲求全類似乎投靠屈服者的行爲和意識。用切實的穩重的步驟與方法，樹立起有力的正確的和平陣營，對外對內以從事於建國的工作，這樣，國家的立場和思想，自然是和平運動出發的基礎了。

第三是民主和科學的立場思想，中國以前未能民主統一，分贓式與割據式的局面，阻礙國家走上近代化的道路，而科學思想科學建設的未能發達，更使上述的局面延長。所以就中國客觀的狀態看來，不但是要提倡民主，而且要建

設起可資以真正實行民主的條件，如國民經濟生活的改進，國民教育水準的提高等等，都是保障民主實際可以推行的先決條件，科學也是一樣，不但是提倡科學，而且要使實際的科學建設切合乎建國的需要。我們爲什麼以爲抗戰可以適可而止而挺身出來倡導和平呢？就是因爲認清楚了中國客觀的環境，需要和平建設，而不需要戰爭破壞。如民主與科學這種事業，都是需要長期建設的。沒有這種建設，中國決不能成功近代的國家，我們主張和平，就是堅決地站在這種立場與懷抱這種思想的。

以上三點，是和平運動的思想骨幹，違背了這三點來主和，我們認爲是盲動主義，應該加以肅清。正猶我們認爲淺薄的主戰論者應該加以排擊一樣。

（轉載三民周刊）

# 我們需要怎樣的和平

中華日報社評

我們所需要的是和平，不是偷安，是永久的革命的和平，不是一時的苟且的偷安。

我們曾經說過：『和平運動是一種革命的行動，是國民革命的一個重要階段』。前一句話是確定和平運動的手段，後一句話是樹立和平運動的目的。

爲什麼說和平運動是一種革命的行動呢？

我們知道，戰爭不是偶然的事，和平也不是偶然的事。戰爭是現狀不能維持而爆發的突變，和平則是戰爭到了極點求所以改造現狀的正軌。所謂改造現狀，不但要由戰爭狀態做到和平狀態，並且要根本掃除戰爭的原因，纔能夠從新確立和平的基礎，一方面要改造國內的現狀，一方面要改造國際的現狀，由改造中日的關係，進而改造東亞的全般關係。

戰爭的原因在那裏呢？

由內言之，在於共產黨之挑撥煽亂；在於獨裁者之剛愎恣肆；在於一般人爲暴力所懾爲宣傳所惑，不能悉心究問：爲什麼要戰？怎樣纔可以和平？

由外言之，在於帝國主義者之縱橫捭闔，以中國爲其角逐的次殖民地，而政治的經濟的實辦主義者唯知信賴外力，供其頤指氣使；在於日本是一個產業發達的強盛國家，中國是一個經濟落後的弱大國家，日本既強，誤以戰爭爲對外發展之圖，中國雖弱，不自知所以轉弱爲強之道，一方厲行侵略，以致他方不得不迫而反抗；而尤其在於中日兩國人民還沒深切了解中日兩國在平等互惠睦鄰友好的原則之下，有共同生存共同發達之可能與必要。

經過了這一場血戰之後，如果還有共產黨徒在作祟，如果還有獨裁政治在作孽，如果還有侵略主義在作惡，如果還有政治的經濟的實辦階級在作內奸，如果中國還不能自拔於次殖民地的地位，如果中國還沒有獨立自主的權力，從事政治改造，經濟建設，發達民族資本，充實國力民力，以爲戰後之復興，如

果中國還不能以獨立自主的國家之資格與日本爲有力的友好合作，以分擔安定東亞之責任，如果中國的現狀還是未改變，日本的現狀還是未改變，因之東亞的現狀也還是未改變，如果兩國人民還沒痛切反省，以前爲什麼打仗，今日爲什麼要和，還沒明白認識和則共存共榮，戰則兩敗俱傷，還沒誠心誠意共謀永久和平，只求一時偷安，有一於此，則戰爭之原因根本未去，即永久和平之基礎無從做起。

打倒共產主義，推翻獨裁政治，肅清買辦主義，排除侵略主義，由此以確立兩國和平，這都是要中日兩國人民下了十二分的革命決心，纔做得到的。

爲什麼說和平運動是國民革命的一個重要階段呢？

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以自由平等之中國，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同盡文明國家應盡之義務，以期同享文明國家應享之權利』。我們所需要的和平，其最大目的，即在於此。只有把握着這一點，和平運動纔有革命的意義，纔有可貴的遠景，纔能夠走上光明的康莊大道。

要是言戰的時候，不以中國之自由平等爲着眼，只知戰，而不知爲什麼要戰，怎樣纔能戰，怎樣纔能夠確保中國之自由平等，那便失了根本目的；要是言和的時候，不以中國的自由平等爲着眼，只知和，而不知怎樣纔可以和，怎樣纔能夠確保中國的自由平等，那也失了根本目的。無目的的戰是妄戰；無目的的和是瞎和。妄戰可以亡國，我們因而反戰；瞎和也可以亡國，我們又何須乎和！

近衛聲明提出了中日和平之平等互惠的基本原則，無領土之要求，無軍費賠償之要求，無經濟獨佔之要求，尊重中國之主權，尊重中國行政之獨立完整，其後日方朝野歷次宣告，亦復本此原則，期與中國的愛國者攜手以共進於東亞之和平，這是表示日本以革命的精神放棄侵略主義之決心，這決心是中日永久和平之所繫。

然而所謂平等互惠，絕不是一種空想，而要兌現的。中日兩國爲什麼要和，爲什麼可以和？是因爲雙方都看透了戰所得不到的代價，和可以得到，戰



則自相殘殺，和則利益均霑。只有從這一個角度裏，纔能夠抓得住中日兩國需要和平的共通點。要是和與戰沒有兩樣，要是中日和平不是以兩國愛國志士之攜手共進爲其基點，不是以中日兩國共同的利害爲努力的鵠的，要是中日和平不是平等互惠的，既不能適應日本國民的需要與國家的發展，也不能適應中國國民的需要與國家的發展，和了之後，日本得不到一些好處，中國也得不到一些好處，東亞前途也得不到一些好處，那麼，在日本只要維持現狀甚至繼續戰爭好了，何必多此和平之一舉？在中國，戰固亡，和亦等於亡，前既不得已被迫而戰，今又何忍被迫而和，就算和了，也不會澈底，尤其不會永久。

我們相信近衛聲明，不但給予中國國民以可和的摯望，而且燃起了日本國民放棄侵略共謀和平的熱誠，唯其如此，所以纔有汪先生的豔電建議，所以纔有目前澎湃東亞的和平運動。我們更深信中日兩國，愛國家，愛東亞，同憂具眼的志士，必能本於近衛聲明與豔電建議之和平原則，努力邁進，求其實現。由去年年底到現在，不過幾個月，而和平空氣已彌漫了中日兩國，甚至平

日反對和平的大美報，也不能不加以承認，此實爲和平運動進展之一個明證。因之我們也愈爲破壞和平的奸徒，共產黨及其俘虜，蔣中正所仇視，挑撥離間，中傷誣蔑，不一而足。其最顯著的，如香港方面，那些無恥的傳聲筒，或則造作院部人事的謠言，以此侮辱和平運動，亦卽以此破壞和平運動；或則半暗半明透露國際調停的消息，以此轉移國人望和之視線，亦卽以此削弱和平運動。這種鬼蜮伎倆，有識者早已洞燭其奸，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我們於此，但願重申兩點意見：

一、中日的永久和平，必以中國之自由平等，中日兩國之平等互惠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爲根據。在這一個大原則之下，其他一切問題皆渺乎其小。我們爲中國之自由平等而努力和平運動，我們爲中日兩國之平等互惠共同生存共同發達而努力和平運動，無一點黨派之爭，無一點權位之私。我們要使世人知道，爲個人權位不惜於破壞光明的和平運動之中奴顏婢膝以儉和的，只有蔣中正；爲黨派利害不惜於破壞光明的和平運動之中陰圖通過蘇俄覓取妥協以宰割西北

併吞內蒙的只有共產黨，在革命的和平運動陣營裏，不會有一個有懷着黨派之爭，權位之私。也不容許有任何一個人懷着黨派之爭，權位之私。

二、蔣中正果能痛自懺悔，忠誠謀和，（註）那真是中國人民的如天之福。我們勸告蔣中正和，我們期望蔣中正和得成功，然而我們要求蔣中正光明磊落的和，不要偷偷摸摸的和，更不要拿國家自由平等民族獨立生存的最低限度條件來做他一個人權位之交換品。至於我們，自從獻身革命以來，不知過了多少次亡命的生活，只要和得成功，和而能確保國家之自由平等，民族之獨立生存，我們願意永遠在野，以在野之身贊助和平，並且願意永遠過着亡命一般的生活，然而爲着中國國家之自由平等，民族之獨立生存，我們責任所在，決不能坐視有損於國家主權之偷和，瞎和，我們就算在野，就算亡命，也不能不在野之身，本着亡命的革命的精神，監督和平。反之，到了和平已無人擔負，而和平又已無可再緩之際，則我們將起來擔負，求和平之及時實現，以使和平之能符合于民族革命之要求，而願意接受國人對我們的監督。

(註)王寵惠請求美國調停的談話，雖因共產黨之要脅，幾次更正，但證之以各方確訊，及日前孔祥熙之談話，蔣中正求和，瞎和，偷和之心事，已畢露無遺。本月十八日申報社評，對於和平問題，有所論列，而指爲日方之傳說，既未肯直予承認，又不能爲之反證，且美國參議員所述孔祥熙請求羅斯福調停之電訊，載於同日該報，兩相比對，自陷矛盾，其詞支吾，愈足見其內幕重重。至於說『議和終有成爲問題之一日，』一反其平日攻訐『主和者爲漢奸』之謾言，益之以十九日張羣對美聯社記者之談話，不再持『最後勝利』，『抗戰到底』之濫調，而亟亟於解釋『何時戰事可以終了，』其欲預爲偷和之蔣氏，曲爲開脫，昭然若揭。然則爲什麼不直截了當的公開言和呢？甲報社評斤斤於繼續侵略與放棄侵略之辯，但近衛聲明，日方早已有放棄侵略之表示且列舉其原則了。王寵惠談話所縷述共同防共，經濟合作，停戰撤兵諸項，那一點不是近衛聲明所已包括，而汪先生豔電所特爲注

意的？這些關係國家自由平等民族獨立生存之重大問題，申報曾無一言論及，張羣曾無一言論及，然則其所謂爲猶未解決的，必另有所在，在那裏？在蔣中正一人的權位問題而已。然而每一次的調停，也都是爲着這個問題而中斷，最近的英國調停，也是這樣，如今天本報所載重慶特訊所說，所以希望蔣中正能夠和，和得成功，只是一種幻想。我們只知求國家的自由平等民族的獨立生存，任何個人的權位問題，不屑一顧，然而如果蔣中正不是爲個人權位問題而爲和平作梗，爲什麼不光明磊落的與天下人共言和平，爲什麼至今不肯以國家民族爲重明明白白的說一句「個人進退，不成問題」！

# 和平運動的把握

中華日報社評

中國是戰敗國，我們憑什麼來爭取平等的媾和呢？我們憑的是下面這個真理：只有媾和纔是中日兩國的出路，只有平等纔能實現中日兩國的媾和。歐戰發生，由於中日兩國政治家的新的幻想與投機，和平運動或許會受挫折，但這種挫折將只有更加證明和平運動的準確性。如果中國的命運是注定了要亡國，日本的命運是注定了要崩壞，東亞的命運是注定了要做非洲第二，那是沒得說了。否則，要是中國還有復興的日子，日本還有振作的日子，東亞還有安甯的日子，那末這個復興，這個振作與這個安甯，是只有從和平運動的實現當中纔能誕生的。我們不相信幾千年來的中國，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與整個東亞的命運，會因中日兩國政治家的無知與不負責任而毀於一旦；我們不相信中國的日本的與東亞的命運會如此脆弱。相反的，我們相信中日兩國與東亞的歷史

的輪子將依然進行，把這批無知與不負責任的政治家軋碎，摔開，而不被這批無知與不負責任的政治家所阻滯而中斷。是這一段偉大的歷史前程保證了和平運動的成功，而我們的把握也就是建立在這個信念之上。

我們相信和局一定會實現，所以我們相信這個和局一定是平等的。因為不平等的和局是一定不能實現的。

中國人目前最擔心的是亡國，因為抗戰不能救亡，所以要和平；要是和平仍然不免於亡國呢，和平要來做甚？這裏請日本人不要誤會，以為中國人既然最怕亡國，日本就可以拿亡國來威嚇，逼成不平等的和局。這種想法等於什麼呢？等於中國人看到了日本最怕延長戰爭，中國就可以拿延長戰爭去威嚇，以取得無條件的和平。中日雙方要是這樣想法，那是只有同歸於盡的。中國固然最怕亡國，但很知道不會是亡於日本；日本固然最怕延長戰爭，但很知道不會是敗於中國。雙方都有弱點，然而雙方都無所施其威嚇。

中國人目前最關切的是復興中國，因為知道中國的命運是與日本關聯的，

所以更關切到復興東亞。要是中國領土主權之獨立完整不能保持，國家不成其爲國家，還有什麼力量來分担復興東亞，還有什麼心思來商量復興東亞呢？

孫先生有過一個很恰當的比喻！民族主義好比窮人的一根扁担，世界主義則是藏在扁担裏的一張發財票，要是先把扁担丟掉，發財票也就一道被丟掉了。這個比喻正可用來說明今日的民族主義與復興東亞的關聯。中國人民和窮人寶貴扁担一樣，寶貴民族主義，這種心理是日本人民在明治維新前後一段期間曾經同樣體驗過的。現在日本是強盛了，她的努力已經超過民族主義了，但她應當認識中國還是窮人，要窮人就來丟掉這根扁担是萬萬做不到的。

中國現在的處境正如戰前的土耳其。當時因爲帝俄繼續逼害土耳其，結局弄到俄土兩國抓住各人的辮子一同跌入世界大戰的漩渦。現在日本要是繼續迫害中國，結局也會弄到中日兩國抓住各人的辮子一同跌入世界大戰的漩渦的。一同跌入世界大戰的漩渦的結果，中國或許遭到和土耳其或塞爾維亞那樣的命運，日本或許遭到帝俄或奧國那樣的命運，對於申國有什麼好處？對於日本又



有什麼好處？

汪先生領導的和平運動就是防止雙方的這種同歸於盡的做法，替雙方指出除了這種同歸於盡的做法之外還有一條共存共榮的大路，那就是實現中日兩國的和平，並且指出只有保持中國領土主權之獨立完整，纔能實現中日兩國的和平。室伏高信先生有一句話說得很好：日本應當去找中國的愛國者講和。日本只有拿這樣的眼光與誠意來認識汪先生領導的和平運動，中日兩國纔能接近。

# 創造擔當和平的力量

中華日報社評

中國當前只有一條路，和平。要是仍在抗戰，來做和平運動，還可以有一個比較，抗戰好呢，抑是和平好？然而現在重慶政府叫的是抗戰，幹的是偏安，在和平與偏安之間是無可比較的。偏安是註定了的亡國的路，要想不亡國只有和平。

可是仍然有人對和平運動冷淡。所以冷淡之故，是因為他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得不到解答，也不想用點心思去尋求解答。這個問題就是：和平要有力量來擔當，可是那一個黨派具有這樣的力量呢？

解答這個問題，第一要打破一種習慣的錯覺，以為蔣介石纔具有擔當和平的力量；第二要認清中國有沒有擔當和平的力量，纔是解答問題的前提，那一個黨派具有擔當和平的力量，則不過是這個前提的引伸。

蔣介石並沒有力量，要是他有力重，他爲什麼偏安？偏安是已經戰不下去，也和不下來，纔走了進去的坐以待斃的絕境。爲什麼蔣介石這一羣也在那裏不時播放和平空氣，不時表示願望和平呢？就是因爲他們內心裏也自明白，再戰下去已經沒有意義，而且再戰下去已經是不可能，戰不下去而偏安是一條死路。爲什麼蔣介石終不敢自己出面，却叫王寵惠他們來播放和平空氣，發表願望和平的談話呢？就是因爲蔣介石已經不能自信他有擔當和平的力量，免得說了出來，做不成功，難以改口，而由手下人來說話，則『修正』也容易，『補充』也容易。爲什麼王寵惠他們播放和平空氣，發表願望和平的談話至再三，却每一次都被『修正』或『補充』所打消呢？就是因爲幹了一頓幹不通，事實證明了蔣介石這一羣已經喪失了擔當和平的力量。

蔣介石沒有擔當和平的力量，國人對他便無可期待，便只有自己來創造擔當和平的力量！

和平的確是艱難的，比抗戰還要艱難。和平與抗戰，是一樣的要有國家民

族的力量來擔當的。初期抗戰，有積蓄下來的現成力量可以運用，其後離開本題的抗戰，又霸住在那裏浪費殘存的力量，以致擔當和平的力量非重新創造不可。現在我們來做和平運動，固然是萬分艱難，但這種艱難不是我們招來的，而是蔣介石浪費國力的結果。南京陷落前德大使調停當時，中國擔當和平的力量要比現在好得多，然而再是一年多的抗戰把這種力量浪費了去；在近衛發表聲明當時，中國擔當和平的力量也比現在好得多，然而再是半年多的抗戰把這種力量快要浪費光了。把國家民族的力量浪費光了，便任何黨派都不能有擔當和平的力量。現在我們所遭遇到的艱難，即使由蔣介石來幹和平運動，也同樣要遭遇到的。可是，國人不願意亡國，便只有大家來做和平運動，沒有現在的力量來擔當，便只有重新創造力量，而力量的泉源即在於全國民衆自身。

蔣介石是在以偏安之局繼續浪費國家民族的殘存力量，我們則在努力和和平運動當中創造國家民族的新生力量。和平運動就是革命運動，革命運動一定能夠產生力量的。中國不亡，和平運動必有成功的一天，我們和國人努力的方

向，以此爲依皈，我們和國人努力的前途，以此爲保證。全國同胞啊！和平運動是困難的，是有許多嚴重的問題的，大家要趕快起來，在參加與監督和平運動當中，以熱烈的情緒與積極的行動來打破困難，解答問題！

# 和平之道

中國公論社論

## 一

中日當初「祇以一念之差，結果竟致鑄成六州之錯」。開始是陰差陽錯的打了起來，此後便是拖泥帶水的打了下去。當時「雙方雖均有不擴大之心，願均處於不得不擴大之勢；迄今雙方雖均有求和平之意，而尙未能實踐蘄求和平之策。於是，戰爭仍然是拖泥帶水的繼續，國力仍然是孤注一擲的消耗。中日兩大民族，已經感到焦頭爛額，西方帝國主義，却是深覺如意稱心！

中日當初雖戰其所不得不戰，而至今已應和其所不可不和！

因爲解決事變不外數途：第一，由軍事力量解決。卽交戰國的軍事力量，經長期的作戰而消長，卒至一方具有絕對勝利的力量。換句話說：日本如能同

時控制中國西北西南的全部，而中國的抗戰力量完全消失，是爲日本勝。否則日本力量疲憊，中國能驅日軍於海外，是爲中國勝。——這是了此戰局的第一個方式。其次，或爲經濟的原因。或中國經濟崩潰而不復抗戰，或日本經濟涸竭而不復戰爭，或由國際壓力加強——或壓迫日本，或壓迫中國，或同時壓迫中日——這是了此戰局的第二個方式。

第一方式雙方均在掙扎之中，我們不願多所推論，然而時閱兩載有餘，雙方是否各有此軍事解決的自信？所謂最後勝利，雙方誰能有絕對的把握？且戰禍繼續延長，即使一方能得到所謂最後勝利，但以「閱牆」的戰爭而致將國力消耗殆盡，是否會得不償失？理有固然，想不待智者而後知。

第二方式雙方均在期待之中，我們姑勿申論演變的可能如何，但期待第二方式的情緒，雙方都不能諱言。不過期待對方的崩潰，或國際的壓力，均屬毫無把握的事。兩大民族的百年大計，難道就不能「自求多福」，而必孤注一擲以求僥倖於萬一？中日兩方當局，謀國寧可如是？

由此以言，兩種方式均非上策；中日事件的合理解決，端賴雙方的澈底覺悟。所以我們堅決主張：

中日當初雖戰其所不得不戰，而至今已應和其所不可不和！

一一

最近國際情勢的變遷，當然影響中日問題的發展，尤其是日蘇簽訂停戰協定以後，中國共產黨人亦不無主和的意向，此由最近抗日陣營中的輿論，可以明白看出。日前上海大美晚報的社評，就曾說過：『我們覺得歐洲戰事已使遠東事件明朗化，假使日本自認錯誤，那麼解決之期已在不遠。當然日本的態度決非朝夕間所可改變，但是歐洲戰事必可使關係方面重新考慮態度和對策』。大美晚報表面雖為美國人所辦，而其言論和一般抗日輿論並無出入，該報所言如此，足證中國一般輿論的轉向。

最近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寵惠氏對美聯社記者談話，曾經說明：



國民政府決計繼續抗戰，直至獲取最後勝利而後止。至於中國的外交政策，至今仍無改變。中國的外交政策，完全根據於條約，尤其九國公約，其中最主要者，即在使此等維護中國獨立完整的條約，得以貫徹。第二，凡與中國友好的國家，中國無不願與其為經濟上的合作。日本若能在完全平等的立場上與我們合作，則我們當然亦可與之作經濟的合作。不幸日本之所謂合作，事實上無非欲將中國供其宰割，如是，則我們自無與日本合作的可能。但九國公約等條約，不僅為各國所尊重，抑且為日本於一九二二年所簽字，今日日本竟悍然不顧一切而予以破壞，則中國除竭其全力以抵抗外，豈有他道？再則，九國公約除為美英法所尊重外，即未簽字於該約之蘇聯，據吾人所知，亦極為關切。就日本目前筋疲力竭的情形言，欲完成「屈服」中國的計劃，實已不可能。自美國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向日本提出破壞九國公約的抗議外，英法兩國，亦繼美國之後而紛提抗議。在另一方面，自中日戰事爆發之後，中日兩國亦立即成立不侵條約，故環日本而處者，莫非反對日本行動的國家。在

日本方面，聊以自慰者，即一內容空洞的反共協定，但至於今日，則此一反共協定，亦已爲德國撕破。故今日的日本，可謂已處於絕對的孤立狀態亦無不可。但於此以前，美國已宣告美日商約之廢止，日本若猶不作尊重條約的表示，則美國即將拒爲日本訂立新商約，日本深知此點關係的重要，故急謀美日關係的改善。野村之被任爲日本外相，其目的即在與美國成立新商約。故美國目前所處的地位，真所謂舉足輕重。在此類情形下，美國甚易勸導日方接受羅斯福總統的調停，同時羅斯福亦易於將建議呈交日方。此項建議，實爲日本結束「中國事件」及避免趨於毀滅的辦法；同時和平若於此時實現，亦爲日本之利，蓋於此歐戰期中，日本若不對華作戰，即可大大擴張對外貿易，故羅斯福總統若於此時出而調解，則成功的可能性甚大。至於撤兵問題，則雙方先行停戰，然後撤兵，王氏亦在個人意見，表明國民政府可以接受此條件。

王氏此次談話的要點，不外乎是：美國在太平洋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適宜於調停中日戰事，使其早日結束；而日本深欲解決其在華作戰的困難，並欲乘

歐戰的機會發展經濟，故日本必可接受調停；至於中國政府，亦可接受調停，唯和平的基本條件，則為主權行政完整，平等互惠的經濟合作，至於共同防共，則因德蘇不侵犯公約及日蘇妥協之後，業已不成問題。

由王氏的談話以觀，可見國府亦已公開「試探」和平。然而時至今日，和平問題迄無端倪，和議始終是撲朔迷離，戰爭仍然是拖泥帶水，所苦的是顛連無告的平民，所傷的是累世不復的元氣。誤國誤民，孰愈於此！

既云中國可和，日本願和，自應立即開始和議。既云日本願和，則不能說日本沒有議和誠意，爲什麼要牽延？爲什麼要迴避？更爲什麼不以現在國內的和平運動爲契機而促成全面的和？

和戰大計，當以國家利益爲前提。當和則和，何所用其瞻顧！交戰國雙方既有和的誠意，儘可直接議和，何必拘泥於國際的調停！

王寵惠氏的談話發表的前後，港滬間和平空氣，盛極一時，然密雲不雨，局勢依然混沌。因此識者譏爲「試探和平」，「玩弄和平」，事實如此，何容

強辯。

二

中國當初縱應當戰，現在已應當和；戰須上下一心，和亦須舉國一致。戰須全面的戰；和須全面的和。

中國如果應當戰，我們舉國上下，支持「抗戰救國」運動，固然無可非議；中國既然應當和，我們舉國上下，也應羣策羣力，支持「和平救國」運動，俾底於成！

最近汪先生所倡導的和平運動是應時勢的需要而產生，凡在國人，自當支持贊助，以期和平運動逐漸開展，而促成全面的和！

然而和平運動與中央政權，雖有其密切的關係，但我們究不能於其間發生誤解。

和平運動是目的，而中央政權祇能說是手段；並非中央政權是目的，而和

平運動是手段。  
中央政權的樹立，並非和平運動的成功；而中央政權的延緩，也非和平運動的失敗。

我們對於中央政權問題，雅不欲多所論列；然而對於和平運動，我們却認為國人都應當支持！

我們祇對事，不對人，祇有公利，並無私念。我們不管什麼時候能和，什麼人能和平，但目前蘄求和平運動的開展，確為當務之急。如其不然，和平機運絕難成熟，而所謂全面的和，更屬渺不可期！

全面的和，乃解決事變的途徑，亦東亞和平的初基。要促成全面的和，決非一朝一夕的事，須以最大的決心作最大的努力，

在應促成全面的戰底時候，而有違反此種意旨的言行，自非國家之福；在促成全面的和底時候，而有違反此種意旨的言行，亦非國家之幸！

現今中日戰事，雖仍拖泥帶水的繼續，但戰爭與和平，亦自有其關聯性。

和平至不能和平，故不得不戰；戰爭至不能戰爭，亦不能不和。故目前和平的運動，固足以促成和平的成功，即戰爭的結果，亦為促成和平的因素。所以我們絕不能因目前戰爭的延續，而放棄其和平救國的工作。

我們要支持和平救國運動，開展和平救國運動，以期促成最後的，全面的和平！

#### 四

然而，最後我們尚有一言：即和平之道，中國人士固須覺悟，日本朝野尤須努力！

過去中日兩國間的誤會太深，日本所給予中國人士的創痛太鉅，因而欲言親善，自非易易。中國爲了避免日本人士的顧慮，日本爲了消除中國人士的猜疑，雙方均應以事實來證明言論，不能把親善徒託空言！

而中國畢竟是弱國，日本尤其應當用事實以昭大信！

我們曾經說過，中華民族最低限度乃至最高限度的希求，祇是維持國家民族的生存。

我們又曾經說過，中國人士所希求的真的和平，是「和平救國」。和平而能救國，中國人士豈必樂於戰爭？和平而不能救國，中國人士寧忍期望和平？

繫鈴解鈴，非異人任；能發能收，始可語於大智大勇。中日戰禍的責任，迄今殊無探討必要；無論世論譴責何方，我們亦不欲多所論列；然而時至今日，中國犧牲一切以蘄求者，絕非報仇雪恨，而僅爲爭取生存，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如果日本能夠明白昭示，中國在抗戰中所蘄求者，不抗戰亦能獲得，則中國何樂於戰爭，何爲而不和平？

和平非易，因爲前途障礙猶多。

和平非難，祇要雙方均有誠意。

和平，是中日事件的唯一出路！

和平，是東亞民族的唯一良圖！

可和不和，曲在中國：繫鈴解鈴，端賴日本。我們希望中日兩大民族，同以最大的決心作最大的努力！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5856B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出版